

贈

書

法國的悲劇

876.5

舊

OID

ANDRÉ MAUROIS 著

江國

悲劇

吳奚真劉聖斌鞠成寬

合譯

944
2624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6732
類號 944 2624 8008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4671
類號 876.5 / 2624

愛惜使用
公用圖書

法國文學家莫洛亞著

法國的悲劇

吳奚真 · 劉聖斌 · 鞠成寬合譯

TRAGEDY IN FRANCE

By Andre Maurois

海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記號

4671

類號

734.294

262A

876.5

時與潮社發行

一九四一年三月出版

這是一本描寫法國劫運的書；內容翔實，文筆生動。莫洛亞先生以文學家而參加英法聯軍服務；且與英法要人如雷諾，龐萊，張伯倫，邱吉爾，甘末林，高特等，都有密切的交往。身歷戰場，目擊實情，所以書中所述的都是寶貴而真實的材料。

盧德曼 (F. L. LUDMAN) 著

原序

我於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到達美國。在戰爭期間，我曾參加英法聯軍。並於六月十日銜命前往倫敦一次。噫，我曾目睹危難中的英法兩國，並接觸到它們的執政要人，和統軍將校。自然，我的美國朋友們要向我詢問各種情形。第一次接談以後，我就曉得，無稽的謠言竟得到善意的人們的信仰了。我相信：亦裸視的事實，雖或使我難堪，但它比真情所歪曲的言論對於我的祖國是危險較少的啊。固然，我絕不會對事事都很熟悉，且不能亦不願作這次戰爭的歷史，但是我能夠而且應當作事實的報導。我要盡力使其客觀而公正。

安特烈·莫洛亞識。

譯者序

安得烈·莫洛亞 (André Maurois) 是法國當代頗負盛名的文藝作家。他在此次大戰中參加英法聯軍服務，並和兩國許多軍政要人有過很密切的交往，因而對於法國潰敗的前因後果，有極深刻而透澈的認識。法國潰敗後，他去到美國，痛定思痛，寫出了這部「法國的悲劇」。

記述或研究法蘭西納潰始末的作品真是汗牛充棟，俯拾皆是，然而大抵都太片斷而零星，不足以滿足人們的要求。在現有的這類作品中，本書實是最翔實而完善的一種。我們很寶貴這部小書，爲使它能早日和讀者會面起見，特由本社編輯，吳奚真，劉聖斌及特約編輯梅成寬三先生以一週的時間趕譯出來，並經石顯儒先生詳細的校閱過。

法國的悲劇是一個最切實而生動的教訓。所有想立足於當前這個國際角逐場中的國家，都應該虛心來領會並接受法國的血腥的教訓。我們謹以最嚴肅的態度把本書介紹給在觀



苦抗戰中的同胞們！

時興潮社編輯部

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五日

法國的悲劇 目次

著者序

譯者序

- 第一章 英法倉皇應戰……………一
- 第二章 浪費了戰初的八個月……………二〇
- 第三章 人事摩擦與戰局……………五〇
- 第四章 納粹的閃擊……………七三
- 第五章 英法怎樣分裂的……………一〇一
- 第六章 法國的遭遇……………一二九

一 英法倉皇應戰

一九三五年歲暮的一天，我在倫敦雷思莉夫人的家裏午餐，在座的有女主人的侄兒斯東、邱吉爾先生。飯後，他拉着我的胳膊，領我到一個小房間裏。

「莫洛亞先生，」他很粗率的說，「今後你不要再寫小說了！也不要再寫傳記了！」
我有些驚愕的望着他。

「現在你所應該作的，」他繼續說，「就是每天寫一篇文章，只是一篇，天天寫，在這些篇文章裏面，你要用自己能想得出的種種方式來表現一個單純的觀念：法國的空軍，曾經是世界上最優越的，現在已降落到第四五位了；一向毫不足道的德國空軍，卻已進展為全世界最優越的了。你不必寫旁詞。如果你把這些事實在法國宣佈出來，而且能促使法國人注意到，你所作的貢獻，將比描寫一個女人的愛情或男人的雄心要大得多了。」

我問着他說，可惜我並不是法蘭西人，這道題目我沒有權威，即使我講也沒有人聽

歸終，我告訴他，~~他~~那樣熱烈的對我忠告。我還要繼續寫我的小說和傳記。

「你錯了，」他用一種有力而含着諷刺意味的音調說，在他那期期難以出口的言語中間常常流露出一種特有的悅耳的情調。「你錯了。現在德國空軍構成的威脅，應該是為法國人所關心的論題。因為你們的國家可以為了這個而滅亡。文化和文學都是好的，但是，莫洛亞先生，沒有力量作後面的文化是、能存在的。」

邱吉爾勸告我寫的文章我永遠沒寫，今天我感覺到痛切的懊悔了。那場談話給我的印像很深，且在我心裏留下永恆的不安。有幾次我向一些有地位的人們探詢我們空軍的情形，所得到的答覆不是閃爍其辭，就是直言不諱的悲觀。

「如果戰爭爆發，」一位統率里希薩炸大隊的空軍上校對我說，我和我的飛和員們決心英勇的犧牲，但是我們所為作的也僅止於此而已！」

「爲什麼？」我問。

「因爲我們的空軍人數過少，飛機也都廢舊不堪。」

九三六年的情形更爲惡化了。王康腹去國王，政府當局無精打采，以及腐敗官僚的敷衍塞責，曾使法國的飛機生產幾乎降到零點。在一九三七年中，法國每月飛機出產量低落到一个幾乎令人難以相信的數字——三十八架；同時期中德國每月出產的飛機在一千架以上！

正在法國一再申明謂着可畏的衝突時，德國卻在萬心積慮，動員起所有的力量，來準備復仇的戰爭。德國已看到了這個地步，並決心要達到目的。關於納粹內部如何脆弱的一些無稽的故掌在法國到處流傳着，這足以象徵出人們內心的願望。所有那些熟悉德國實情的人士們——例如，駐德的英國大使費蒲，法國大使龐泰——幾年來就屢次三番的向人們提出過警告。我還記得白已在一九三七年時和他們的談話：

「不要存任何幻想，」龐泰說，「德國是堅強的；它自己知道，而且下定決心要運用它的力量。英法現在有兩條路徑可走，而且只有兩條：我們兩國要棄絕一切，以所有的力量來建立起無敵的軍備，否則就必須說法與德國謀取諒解。」

「但那是可能的嗎？德國需要同我們諒解嗎？」我問。

「德國啊，」應答以一個刻薄的幽默家的諷刺口吻說，「德國什麼都不需要，也什麼都不需要。……德國希望活動，就是說，要改變……他們的領袖們都是野心勃勃好大喜功者。你想說殺他們的氣餒嗎？在萊茵河的兩岸，建造兩座高大的梯子，那一岸排列着幾百萬德國青年，手持着卅字旗，這一岸排列着幾百萬法國青年，手持法國國旗，讓這些青年們以有條不紊的陣容從這梯子上爬下，這時，在一葉扁舟之中，甘末林將軍和希特勒會晤於萊茵河的中流。如果我們本身能強大起來，法德之間才有諒解的可能……但是如果你只用一些巧計和外交辭令來維繫對第三帝國的關係，如果不建造飛機坦克而繼續發表演說起草照會，那樣我們是在走向戰爭，而且無從獲得勝利的。」

對德國實力作新估計的，不單是表一人。其他各國的人士，把估計的軍費和英法兩國的增加比較，都很清楚的看出了歐洲實力均衡已經打破中……而且許多國家都在提防着。法國駐波蘭大使賴洛瑞特對我說，在他看來，被認為了一九三六年以來的對德態度而

遭受破壞，是有些冤枉的。

「你要他們怎樣呢？」他說，「他們到了德國在重啟軍備，而英法連一點見對抗的準備都沒有。他們看到了，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希特勒進軍萊茵時（這是一個完全違反羅加諾公約的行動），法國不會伸出一個手指來制止他。他們聽到了法國總理由無線電廣播說，「我不容許把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置於德國砲火射程之內。」後來他們懷着迷惘的心情轉向了法國，在這一演說之後並無任何實際行動；他們就喪失了對我們的一切信心。波蘭的領袖們，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對我們說過：「如果你們不來制止住德國的重整軍備，我們就不得不變成它的朋友了。」就在波蘭對我們失掉信心的同一時期，比利時和南斯拉夫也爲了同樣緣故而不敢信任我們了。」

像這樣缺少外交上的準備，把整個歐洲丟給德國的手裏，英國所負的責任，至少是和法國同樣大的。在英國，許多有力的集團聯合起來牽扯着政府，使它不能採行一種勇敢而

遠見的外交政策。倫敦的銀行家們關切着他們貸予德國的款項，因而懷着一種單純的希望，堅持的認為同一個高喊着以自給自足為目的的國家，滿意生意可作。還有某些英國要人們，被布爾塞維克主義嚇昏了，愚蠢地認為納粹主義是防止革命的法寶。同時，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們也在鼓吹着不惜任何代價的和平，並主張單獨的裁軍，殊不知這就註定了自由主義的死運。所有這些趨向都在堂而皇之的替德國作開路先鋒。

無疑的，英法一般平民已百感到我們的弱點，所以在一九三八年極力反對戰爭。這種情形很可在慕尼黑會議時看出來。那時美國輿論曾嚴厲的抨擊張伯倫和達拉第。但是美國人並不明瞭實際的情勢。他們不怎樣曉得倫敦和巴黎市民們的心情。那兩個都市的人民們，看到自己沒有防空洞，沒有防毒面具，沒有高射砲，到處都流傳着可怖的謠言（這應該歸功於德國宣傳的效驗），說兩顆重的炸彈怎樣可以毀壞全城各地，以及在他們的頭上將有如何厲害的毒氣散放下來，當時他們具怎樣一種心情呢？

英法的健兒們，如果必須走上疆場殺敵。像一九一四年那樣，他們都很可十分英勇的

作戰，現在卻爲後方的轟炸而喪胆了，因爲他們的妻兒們將作了後方戰爭中的犧牲者。所以，紐約人們認爲是一種恥辱的慕尼黑協定。倫敦巴黎的羣衆們卻以令人難於置信的熱誠歡迎着。明明是外交上的讓步，卻竟作勝利一般慶祝着。巴黎市參議會某一議員居然提議，把張伯倫簽訂屈辱條件的「九月三十日」作爲一條街道的名稱！

張伯倫，慕尼黑談判的製造者。這也是奇蹟的天命使然罷：以一個伯明罕的市長，無黨董事會的主席，慣於和那地產契約爲神聖的老商人們往還的商人，現在卻同一個堅信自己除了對德國之外無其他責任，除非對德國有利一切對外協定都無價值的第三帝國的擴張的元首當面打交代了。張伯倫比任何其列英國人都更淺見，在會晤之前，就不會想到會有像希特勒那樣一個人。在他動身到貝茲加去的時候，一位英國朋友對我說：

「張伯倫並不真信希特勒比他自己一樣是伯明罕協會的會員，但他確信希特勒是曼徹斯特協會的會員。」

這話是對的。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張伯倫曾帶着博爾斯兩月後的一天晚上，他在法蘭西北部向幾個德
國人談話，在貝茲加登作客的情形。希特勒對他說：

「我們要單獨談話還是和你的隨員們在一起呢？」

「單獨談。」張伯倫回答說。

於此希特勒領他（還有翻譯史米特博士）到自己的辦公室。房屋很小，裏面放着一
張狀，牆上只懸着一幅精美的圖畫，從慕尼黑博物館運來的。而且時常的更換着。德國
元首的談話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對方想插入一個毫無知的答覆都不可能，這使張伯倫有
些迷茫了。

「當我到葛特斯堡作第二次會談時，」張伯倫說，「時跟他談話進行。同話，使我了
刻覺得，以那種語調開始的會談，無論下去也不會有什麼用處。每隔幾分鐘，顯然是有着
預定計劃的）就有一個軍官進來，遞一元當一份電報。一捷克人打死了兩個德國人，「希
特勒是幾乎要號叫的樣子，面容上充滿了憤怒。一該血的仇恨必要報復。我一定把捷克人

都消滅！」看到他的憤怒起來（請不論是否假裝出來的），他便對他說，最好會以暫時停頓，我回旅館去了。因為住處是在萊茵河的對岸，我必須乘一艘船。在告辭的時候，希特勒送我出來到平台上，一面還在和從前同樣狂熱的叨叨不休的表白着自已。在那種情景之下，他忽然止住了話頭，以非常的速度改變了面容的表情，他俯視着下面如帶內萊茵河水，用一種和藹的、幾乎可以說是溫柔的語調說：

「啊，首相先生，真是天巧，我正想指給你看前面這片美麗的景色，……但現在已爲霧遮掩住了……我向來沒看見過一個人在野蠻的忿怒向詩意的幽情轉變這樣突然。」

跟隨張伯倫赴德的一位隨員告訴我，那幾次會晤曾留給首相一個不能磨滅的苦楚的印象，像那種狂熱的憤激他從來沒有見過，而且現在，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提到希特勒的名字，「他就像被人整過或燙過的本利的伴出一付痛苦的表情。」但是張伯倫認爲維持和平是他的天職，他會自甘能夠功歸圓滿。

英法八民仁寄信似的默功願德的信件也很鼓勵了他。法國各地萬萬千千的異鄉鴉囀信

給他，道出了他們從心之深處對他的感激。爲了他從戰禍中拯救了他們的國家，使她們的田園不成廢墟，使她們的子女們免於死亡。法國農村裏的老太婆們爲他織大手套。「爲的是，」她們用戰慄的手在信裏這樣寫着，「他坐在飛機裏不致受涼……」所有這些都使溫柔而軟心腸的張伯倫夫人異常感動，她鼓勵着丈夫努力奉行綏靖政策。

那種政策，在慕尼黑會議以後，就不再爲英國人所歡迎了。英國的輿論，因爲自己國家的陸空軍都沒有準備，不得不忍氣吞聲的接受了慕尼黑協定。他們已嚐到這付藥的苦頭，感覺到這種處置的恥辱。他們立刻下定決心，要作一切必要的犧牲，以期將來不再遭遇到同類的屈辱。一九三九年一月，我到英國各處作旅行演講，走遍全國各個角落。當時我發現了英國一般的輿論已走在政府的後面。政府對於徵兵正在躊躇，國民卻迫切的要求着。到處都有英國各階層的男女們對我說：

「我們一定不能容許再將這東西供給歐洲；我們非有強大的陸軍和空軍不可。」

回巴黎後，我發表了一篇文章，裏面說英國將於三月實行徵兵，許多法國朋友們都認爲我發瘋了，他們說英國決不會在和平時期強迫徵兵，因爲那樣作是違背它一種最古老的傳統的。但是到了一九三九年三月，英國到底實行了徵兵法案。

德國進軍布格格，是對於張伯倫以及所有他的經濟政策的信徒們一個痛苦的打擊。這位英國首相在心的深處感覺到震驚。他會深信希特勒決不會吞併非日爾曼民族的。現在事實給他的證明完全相反。他突然變爲（這事實許多人都不會理會到）希特勒在英國最堅決的敵人了。就是在這種憤怒情緒支配之下，他才出乎預料的對波蘭提出遠大的保證。那時我在美國，馬上這樣說：「戰爭就要爆發了。」因爲那是必然的，在德國方面一定繼續略侵，進攻波蘭，另一方面，英國一定要維持信義，因爲它在幾個歷史當中一向都履行條約義務的。英國既已突然的採取了這種積極的政策，必然要和法國作更密切的諒解。一九三九年六月，英法協會在巴黎舉行一次大會，出席的有英陸軍大臣格羅夫，法外長龐萊和甘末林將軍。當時格羅夫宣稱，在戰時英法兩軍隊將受法國統帥的指揮，他並以能夠得呼「我

酒味甘美林將軍十分愛吃的。在過期的陽采露中，這林部員很淡薄的。晚餐以後，我們加倍量度回到波蘭大使館，那兒正舉行一個盛大的跳舞會，他急驟由於他的出席參加波蘭的舞會。

直到現在我對那情景還保持着一個鮮明的記憶。那是一個幽美的夏夜。在大使館的花園裏面，白大理石的人面獅身像在這星下面照耀着；音樂隊正在奏着舒邦的 *Waltz* 曲，舞臺上火炬，向會場裏放射着一些烈焰似的光芒。在青草地上，穿裙子的美女們（德國大使館的兩個漂亮的女兒也在其中）正同波蘭的官員們跳舞。我們大家都這樣想，戰爭逼近了，波蘭將是第一個遭受攻擊的，這一場合很危險。盧大監前夕威靈頓在布魯塞爾召開的那次國舞會。那些部長和大使們，開懷談笑着香檳，談論一些瑣屑的題目。有人談到巴斯多號（*Basstos*）的處女航，還有些人談到他們要到南美旅行的計劃。

幾天以後，荷里度又到巴黎，邱吉爾回來，參加七月十四日的舞會。那一天前情景很濃烈，算是巴黎最後的快樂日子。法國軍隊從來沒有比那天更感風過，在行列當中把法國

爾次變現得事露無遺。騎兵、步兵、海軍、外國隊，和馬其諾防線步兵，浩浩蕩蕩，壯觀得很。邱吉爾滿面風光說，「感戴上帝，使法國有這樣優秀的軍隊！」那時我們還不知道，他們的勇氣、武德與忠誠長能保持，會因機械化裝備的善後而變壞奈何。坦克陣容的出現，再度使總督興奮，使他熱心無限讚美，但是他們沒藏入講過德國的現勢，不曉得德國的坦克數目比我們更多，裝甲更堅固，不是我們的戰車防輾斃所能毀壞的。

那天下午，倍里度去看我們，有他一個上校副官隨着。他談到了他在英相建軍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難：

「徵兵是再好的一件事，」他說，「但是現在在英國已是法定形式而很難實行。我不能把所有登記從軍的人都召集來，因為我既沒有那麼多武器供他們用，也沒有那麼多幹部來訓練他們。」

「上次大戰的軍官呢？」我問。

「他們不懂新武器。」

「如果天下戰爭就是法、德兩國出多少師來援助我們？」

「那末法德兩國呢？不超過五六師。」

這數目實在太少了。在星期前，協約國的參謀本部要求英國在這個戰爭中出兵三十二師，更使我震驚了。我記得，在一九一八年，英國出兵八十五師助戰，那時英俄意日等國還是我們的同盟國，我們做主在一系列的之中得以戰勝。現在的情勢怎能不使人感到嚴重的憂慮呢？

當時法國外長曉萊也有這樣的意見。我聽得他詳述下面的事情：

「在戰爭爆發的前幾天，」他道，「一九三九年的八月杪，我把兩位負責法國陸空軍的將軍請到我的辦公室來。我告訴他們，現在我們已經臨近了戰爭，如果波蘭不肯讓步，戰爭短期內就要爆發的。『可是，』我又說，『如果你們告訴我，現在就開戰我們沒什麼尊利的把握，我還可以讓波蘭把但澤和走廊讓給德國。我知道這樣作是冒着嚴重危險的，

人們要罵我，說我在出賣捷克之後又出賣了波蘭。但是我不管這些。我寧肯犧牲一切，也不願讓法國毀滅。而且，法國如果毀滅，波蘭也不能倖存。你們不要誤會，以為我對德國的戰爭決心還有什麼幻想。德國對歐戰已準備了七年，如果不能用單純的戰爭威脅取得了盟主的地位，它遲早要動手的。但是戰爭的爆發遲延些，對我們就有些好處。再有半年或一年的工夫，容我們加緊努力重整軍備，總是有利我們的。這就是現在我為什麼要問你們：「我們現在有無緊迫的軍事理由，需要波蘭作這無犧牲？」他們兩人分別答覆我說，他們看不出什麼軍事上的理由，應該延緩戰爭的爆發，因為延緩對於德國也是同樣有利的。在那種情形之下我便無話可說了。」

可是他還作一次最後的努力。在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一時，已被調任為法國駐意大利大使的龐賽打電話給捷。說齊亞諾提議召開一個會議，以解決波蘭問題和其他紛爭。龐賽相信齊亞諾的說詞是不或問題的；意大利並沒準備作犧牲；它同德國的條約還容許它二年的期限；意大利的一言與論也都厭惡戰爭；齊亞諾和里賓特羅甫上一次的會談據說並不怎樣融洽

；意大利不作戰也可在會議談判中得到大部分它所希望的。所以這種會議對意大利是和對英法同樣有利的。恩萊決心讓自己應權所及來支持這個計劃。據他對我講，他馬上去見達拉第，把意大利這個提議報告他，然後說：

「今天晚上六點鐘內開開會；我要主張接受意大利的建議，請你支持我。這樣我們就可以既成事實呈現給憲圖了。」

達拉第應許了。但是恩萊對於德盟的覺悟太清楚了，一個老實人，缺少堅定不移的意志，難講話他卻滿。那一個整整的下午，恩萊的心情總是在焦急不安中，事實上也難怪他，因為到晚上內閣開會的時候，達拉第並沒表示支持他。意大利的建議雖然沒被確定的拒絕，但是內閣表示希望先看一看德盟以該建議所行的情形。當晚九時官方發表的公報只簡單地說：「內閣對履行該建議一點意見也沒有。」在九月一日黎明時，德國軍隊就長驅直入國境被圍了。

第二天下午五點鐘，德軍佔領巴黎，巴黎政府遷往南特爾，德軍佔領巴黎，巴黎政府遷往南特爾。

對方驟願就說：

「我是齊亞諾，現在還有龐賽和格林（Percy Horsfall 法國駐意大使）在我的辦公室裏。我相信進行會議談判現在仍然可能……」

龐賽答應齊亞諾在次日（星期日）午刻以前不向德國提出最後通牒。

在這當兒發生了一個離奇的穿插，我相信直到現在人們還沒明白。原來法國方面，還守着龐賽發出的諾言，到星期日中午才把最後通牒送交德方，在下午五時才向德國宣戰。可是，在另一方面，英國卻在九月三日上午十一點鐘對德宣戰了。這種離奇的步驟，中間也有些緣故：

岡慕尼黑時代的情形完全相反。一九三九年的英國一般輿論極端反對新的投降觀念。國會議員們剛剛在假期中有機會同他們的選民們談過話，很為全民間一種非常的決心所感動。英國羣衆們既然相信戰爭已不能避免，就認為莫如及早幹完爲妙。國會議員們深受民間輿情的感召，他們決心不使張伯倫再表現出前一年夏天的弱點。結果，在九月三日上午

九點，哈里法克斯打電話給龐茲說：

「我曉得你不能在中午以前向德國提出最後通牒的理由，但是我們也沒對齊亞諾作同樣的諾言，而且我們有不得已的苦衷要在今天上午發出對德的是最後通牒。下議院今午開會，如果首相不履行他對波蘭的諾言而出席，大家一致的憤慨情緒會把他推翻的……」

這兩個同盟國先後對德宣戰，中間有六小時的間隔，就是爲了這個緣故。

於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戰爭開始了。

這場戰爭，德國已經預備了很長的時期，英法則毫無準備，而且德國還極其巧妙的使英法來宣戰。

今天我們可以這樣說，就法國而言，在戰爭發生時他就開始戰敗了。

戰敗了，因爲我們沒有夠用的飛機，坦克和高射砲，因爲我們沒有夠用的工廠來製造起我們所缺少的東西。戰敗了，因爲我們的盟邦的軍隊人數太少，而且沒有擴張的方法。

足以使它馬上利用它的貯藏的財富和人力。

在本書開端我所提到的談話當中，邱吉爾曾作過一個譬喻，我認爲是十分警惕的。當時我問他，爲什麼英國在有權制裁的時期還讓步，容許意大利爲所欲爲：

「你是否曾經觀察過龍蝦的習性呢？」他問我。

我回答說，我從來沒對龍蝦的習性發生過特殊興趣。

「好罷，」他說，「假如你有機會，應該研究一下這種動物。它們是很有趣味的。龍蝦在一生當中要幾次脫掉護身甲殼。在脫化期中，最勇敢的龍蝦也要退藏到岩石的隙縫裏，耐心的等待着，直到新甲殼長成的時候。新甲殼一經堅強，它就要從隙縫衝出來，再作一個戰士，作海上的霸王……英國，由於輕率而懦怯的當政者們的錯誤，已失掉了它的甲殼；我們必須在石縫中等待着，直到我們新的甲殼堅硬起來的時候。」

可是啊，情勢逼迫着英法兩國，在舊的甲殼已經失去新的甲殼尙未長成時，就從石縫裏衝出來，同一個最兇暴的敵人戰鬥了。

二 浪費了戰初的八個月！

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初，第一批英軍到達法國不久之後，我接到英軍司令部一封信，請我去作他們的「法國聯絡官」。我未來的職務是隨着作戰部隊行進，以文字和廣播演說談話等方法保持英國軍隊和法國人民間的聯繫。

上次大戰的四年中間我就是英國軍隊中作「通事官」的；和英格蘭、蘇格蘭的伙伴們在一起的共同生活，在我的腦海中遺留下最快活的記憶。我的第一部著作就是描寫他們的。所以，對於英國方面這一熱情而誠摯的邀請，我自然有些心嚮往之。因為我是法國的後備軍官，所以我把這封信呈送上峯，馬上就得到一個命令，准許我去擔任這個職務。於是我就穿上中尉制服（這是我在一九一八年的階級，）到阿拉斯（Arras）去見英軍總司令高特將軍。

那時高特將軍正駐節在阿拉斯附近的哈巴克別墅（Chateau d'Harbecq）。他的頭腦

副官：戈登，是一個儀表堂堂的蘇格蘭軍官，穿一條格子呢的短褲，一把漂亮的銀柄短刀，插在帶有縐邊的長襪統裏，另一個叫孟斯特，爲人和藹可親，是英國威靈第四的後代，這兩個人來接待我。他們送我一種奇特而強烈的混合酒來喝，這種酒他們稱之爲哈巴克酒。然後他們說：「現在我們領你去見總司令。」

從來沒有一個總司令的辦公室比高特將軍的更簡單了。在門上有四個圓釘釘起的一個字跡潦草的卡片，上面寫着「總司令辦公室」。屋子裏，有兩隻白木架又起的一塊木板，就是高特將軍的辦公桌，此外沒有別的傢俱。這種簡單的佈置是有意義的，因爲高特將軍認爲一個統帥的生活應該和士兵沒有兩樣。他生性極端好動，在戰時惟一的遊戲和消遣就是走路。每天黎明時，他就出現在阿拉斯周圍的泥濘的道路上，臂肘緊夾着身軀，頭向前伸出，頭上的金紅小帽傲然的抗拒着風雨，一個副官氣喘吁吁地在後面跟隨着。

戈登告訴我，有一天，總司令帶他到克利奧飯店去同甘末林將軍開會，他心裏很高興，滿想能在巴黎快快活活的過一夜。但是剛吃過晚飯高特將軍就對他說：

「現在我們出去走一走」。

於是，他把臂肘緊夾着身軀，頭向前伸出，經過瑞佛里路（Rue de Rivoli）和碼頭，繞着露佛宮（Louvre）很快的兜了三個圈子，然後回來睡覺，一個抑鬱不快的副官仍在後面跟隨着。

第一次見到高特的時候，他的青年，有力而活潑的風度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倍里廈已經復興了英國的軍隊，他的努力是有代價的。

高特將軍首先講到希特勒的計劃：

「他要經過比利時進攻嗎？我想他要的，」高特將軍說：「因為這是他的惟一可能運用的戰場。福煦說過，「在戰爭中要作你所能作的，運用你所有的。」不過，我想希特勒不會於冬季裏在佛蘭德斯的泥淖之中發動攻勢的，如果幾個月內沒有任何戰事，我們的士兵們一定要感覺厭煩的。請想一想，冬日天短，四點鐘就黑了天，士兵們走向潮濕而銷燬的營房裏，在幽黯的燈光下，他們的心情是怎樣一種况味呢。」

「但是，在一九一四年我們整個的時間都是在戰壕和避難洞裏度過的。」

「這不能夠相提並論」，他說，「那時大敵當前，交鋒對壘，我們總閒不下。現在呢，我在據守里爾（Lille）和杜亞（Douai）前面的一條防線。」（他突然站起來把地圖上的防線指給我看）「我們的面前只有中立國比利時。在這種情形之下想維繫住士兵們的戰鬥精神，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如果這種停滯的局面延長下去，我們必得想個辦法來調劑他們的心情。耐菲而特爵士曾送來一些收音機，但是應用起來也有問題，因為軍營裏面沒有電，不能用這些交流收音機，現在我們只好應用蓄電池，這樣就必得把收音機裏面的電槽重新裝置一遍。我正在設法來找些車輛，裝備上收音機到各個部隊裏去放送。」

他又講到了根據情報人員所報告的德國在波蘭爲對付蘇聯而建造的防線的情形。當時一般人們仍然希望那兩個國家的友好關係，不會長期保持下去，這是他們念念不忘的幻想之一。然後他就談到我未來的工作：

「我要你把法國軍隊的情形，儘量告訴我的弟兄們，再把我們軍隊中的情形儘量講給

法國士兵們。然後我們還要設法使兩方的隊伍常相聚會。昨天我的警衛隊曾和你們的騎兵在一起午餐，這類事情應該常有。我本人也常常看到季洛特（Gillard）將軍，你們第七軍的司令官，駐紮在本軍的左翼。他真是一個優秀的軍人。」

他方才送給我的紙烟燒到我的手指頭了，我四下尋找烟灰碟的所在。

「啊，就扔在地板上罷。」高特將軍說。

因為，高特主張在戰爭生活中要放棄一切無用的物品，所以在他的房間裏就沒有烟灰碟。

第二天，我開始視察前線，確如高特將軍所說，在防線的對面，除了一些官樣文章的障礙物和比利時的警察之外，真是一無所有。可是一旦德國侵略了比利時，這兒馬上就要變成一個大戰場。他們這樣脆弱的防禦，不能不使我感覺到驚懼。

我屢次聽人講過馬其諾防線止於蒙美第附近，但是我還在很個氣的認為有一些堡壘把

開線沿者比利時邊境延長下去，這些延長的部份雖然不如防線本身那樣堅固，也不是可以輕易攻破的。可是，今天看到了這一帶使人觸目傷心的情景，這種脆弱防線的防線就是使我們免於遭受侵略的保障啊，當時我內心的震驚和痛苦，是生平所從來沒有過的。

在一九三九年十月，里爾一帶的防線是怎樣一種情形呢？每隔一二公里，有一個水泥的小砲台，周圍按設着電網，每一座砲台裏駐着五六名英國兵，由一名中士或下士率領着，有輕重機關槍各一挺，瞭望鏡一架；此外還規定有戰車防禦砲一門，不過當時只有砲座在那兒，砲要到以後才能來。

在砲台中間橫着一條戰車防禦溝，不太深而且又多處塌陷下去了。在這後面，有些英國兵正在挖掘戰壕，但是，當着這個時季，在佛蘭德斯的深深的泥淖裏，這種工作顯然是徒勞的。這些不幸的人們在黃泥裏挖下幾尺深去，就遇到了水。他們努力來把水抽乾，好像在表演一場驚人的奇蹟，因為壕裏的水是無窮無盡的；於是他們用草泥建立起一些高土臺，上邊架着葦泥板，結果也沒有什麼用處。英國的戰地記者們，多半和我一樣的參加過

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的戰爭，都用一種責難的眼光來批評這些戰線。

「如果我們的防線就是這樣」，他們說，「只有請上帝幫助我們罷，敵人進攻的武器已比一九一四年強了十倍，我們防禦的設備却比那時弱了十倍！」

當局爲的要安定民心，對新聞檢查極爲嚴苛，這些誠實的記者們不能將防線的實際情形報告給後方，都感覺到極端的不快。

這一條防線守軍的長官們都竭力壓抑着自己的悲觀心情。有一個軍官把他的士兵們正挖掘着的一條可憐相的戰壕指給我看，用一種辯解的口氣說：

「這種壕溝顯然的阻擋不住坦克的進攻。可是前面有一個茂密的樹林，我們很有理由判斷敵人的坦克不從這兒來。」

但是，在以後的幾星期中，許多英法的工程師們都在努力於建造防禦工事。在防舍前衛線的後面，一羣羣的工人們在辛勤的建造着另一整水泥的工事。舉目向田野一望，到處都可看出已經搭起來的高高的鐵架子，旁邊有從英國運來的水泥專家們在混攪着泥土和砂礫

。在法軍防區裏，尤其是在摩柏日（Montebourg）的前面，新的砲台都被偽裝起來了。看來多半和平常的家屋沒有差異。這些都使他們的最高指揮部充滿了信心。

這時，法軍軍隊裏許多人都在讀英文諾（Chauvineau）將軍的一部著作「入侵不可能論」。這位將軍是陸軍大學的教授，他所得到的結論是水泥砲台可以抵擋住任何侵略。他的書裏面說：「這種工事，可以很快的完成，在敵人可能攻克第一線的時期當中，守軍又可以建立起第二線……」可是有兩樣事情他未曾考慮到：第一，敵人對進攻水泥堡寨也許有新的方法，第二，敵人也許突破一點，竄到防線的背後。實際上，我們的士兵們在嚴冬的寒風冷雨中辛辛苦苦造成的水泥防禦工事，從來沒遭受過敵人的正面進攻。

而且，有大多數專家們都和高特將軍的見解不同。認為敵人不會進攻比利時。他們在文章裏發出了這樣的問題：「德國爲什麼願與比利時敵對呢？比利時的軍隊人數相當衆多，裝備亦很精良，德國怎肯把這份力量加給敵人呢？」在另一方面，他們又堅持說馬其諾防線是牢不可破的，因此，希特勒只有兩個可能的進攻戰場：荷蘭和羅馬尼亞，然而，

特丹是德國的後園，羅馬尼亞正以其過剩的汽油供給第三帝國，德國也未必就選擇它們作進攻的目標……」他們所得的結論是：德國在本年夏天不能有所動作，這種局勢對於英國甚為有利，因為「時間會幫助我們的。」到一九四一年，「我們可以控制了天空，到了一九四二年，我們就可以有夠用的重砲和坦克，足以進攻西格弗利防線。」當時人們的意見都是如此，這意見已成為防線裏餐桌上最流行的談話資料。我自己也曾這樣表示過。

希特勒在講到英法的時候曾經說過：「我要瓦解他們的戰鬥力」，在逼宣而不戰的漫長冬日裏，他這種抱負已經有了成就。士兵們在雨水下面千辛萬苦的挖掘戰壕，卻連個敵人的踪影兒都望不到，自然要漸漸的感覺厭煩了。當時很可能而且應該把這些軍隊輪流着調出防地，施行一種應急的訓練，使他們能夠應付一種新奇的而恐怖的戰爭。我們應該完全接受並實行波蘭戰役中的一切教訓。但當時我們對於戰爭的警覺性太不夠了，將領們的措施仍為一些只能適用於平時的顧慮牽制着。有一次，我詢問一位將領，為什麼他不設法使他的士兵們習慣於噴火坦克和俯衝轟炸機的景象呢。

「如果事前毫無經驗，第一次在戰場上看到這些東西，」我說，「他們一定會被嚇住的。最好設法使他們對這些東西習以為常，到時候自然就不會怕了。」

「你說的完全對，」他回答我說，「我會屢次設法這樣作過。但是地方當局極力反對這件事，理由是坦克演習會踏壞了田禾，影響農民的收成。」

前方的士兵們都在談論着煩悶問題，把敵人進攻的危險丟到腦後了。在戰爭初起時，士兵們都缺乏毯子，背心和皮鞋，於是許多徵募軍品機關成立起來，為他們徵集勞軍袋和香煙。過了不久，在前線的士兵們都接到了很多的禮物，很多的包裹。

一個英國兵很正經的對我說：「即使為酬答人們最大的好意，我一天也吸不了二百支香煙啊！」

在那同時，倫敦和巴黎一些識時務的人們創辦了種種花樣翻新的店舖，出售軍用書籍，軍用收音機，軍用娛樂品，軍用滑稽大觀，軍用遊藝術，軍用藝術，軍用戲劇。一位機智的婦人，為這種煩囂擾亂得不耐煩了，很幽默的說她要創辦一個新的店舖：出售軍用的

戰爭。據這話信是一針見血，可惜一般人不能普遍的領悟到。

在英軍的前線，有一些著名的喜劇演員和美麗的舞女們組成的歌詠隊。坐着用汽車，由軍官們鄭重其事的護送着，到各部隊裏作旅行表演。莫里思、夏佛來爲兩國的士兵們表演歌詠。他在阿拉斯的出現，比法國總統勒白倫更受士兵歡迎，更能引起他們的興奮熱烈的情緒。英法的士兵們一致向他們歡呼喝采。法國兵喊：「莫里思，請你唱『發楞泰（Valentine）』！」英國兵叫，「莫里思，請你唱『雨滴』！」他離了舞台，就被一些要求簽名題字的人們包圍住了：「莫里思，請你爲我的小孩們留個紀念罷。我已經是作了爸爸的人了。」走到門口時他又轉回身來對士兵們說：「上帝賜福給你們，青年們！」

這些事情固然無傷大體，但是對於準備防禦英國進攻上有什麼幫助呢？在國家空前危急的時期，只有幾個星期的時間，可以利用來彌補過去向錯誤，完成防禦工事，訓練士兵，在這會兒英法兩國的士兵們（除了前線裏某些部分）卻還在軍閥政治的瑣屑規則之下過着當時的生活！

在我駐紮所在的阿拉斯城裏，有幾千名地方軍隊已動員起來了。這些人都是些老練的士兵，奇怪得很，軍部絲毫也不想法來借重他們，軍官們讓他們作的，充其量也不過是種菜蔬，飼家禽餵養豬狗一類事情。這些固然都是很值得稱讚的企業，但是用他們來加強阿拉斯和斯卡普河的防線，豈不更有些。一個司令官，我的朋友，因為斗膽向他的上峯深述這個意思，而受到嚴厲的申斥：

「加強斯卡普河的防務！敵人永遠不會進到那裏來的！你是個失敗主義者！靜候命令！」

有過一兩次這種經驗，即使是最熱心的將領也只好不生不死的敷衍着例行公事了。士兵們飽食終日無所事事，一天天的胖起來了。英國兵們，一到黑天就開始給自己的太太和情人們寫那無盡無休的信，真使檢查信件的軍官們感覺到頭痛。倒楣的連長，桌子上一大堆信件還沒清完，又有更大的一堆送到上面了。這些戰士們，應該牢記在心頭的是自由前途和人類命運都靠着他們戰鬥本領和抵抗實力，現在卻為日常生活中的瑣屑事放用了腦

個的精力。猶如希特勒所說的，他已經瓦解我們的戰鬥力量了。

可是，希特勒並沒有把我們的戰鬥力量完全瓦解了。有些人們的愛國熱情的高潮始終超拔在一般的平凡水準的上面，永遠不使自己在瑣屑的日常生活中腐蝕下去。十二月杪，我在馬其諾防線過幾天，那裏的一切情形都使我滿心的讚揚。不僅這條「玄妙莫測的山脈」，發聲森嚴，槍砲羅列，又有極週密的防毒設備，使我感覺到（也許是錯覺的）這條防線像金城湯池一般，而守衛這一要塞的戰士們也都使我十分的欽佩。

他們差不多都是洛林人，從堡壘附近的地區被徵調出來的。因此，即使在平時，他們每星期日都要到那兒去的。我看到一些從麥次（Metz）來的青年軍官，律師和工程師，他們八年以來每個週末都要到馬其諾防線來，計算着砲火的射程。他們這樣勤勞的結果，已能使砲火的發射極端準確了。在砲台前方的「指示者」，手裏拿着附近地區的圖片，上面標着一帶地方分爲若干方塊，編成號碼，假如發覺敵人在「B二四八一號地，只要用電話

聽一聲「B二四八」，十秒鐘後，敵人所在的地方就會成爲砲火集中攻擊的目標了。

這些青年人對於自己的軍備信念，對於守衛營地的忠誠，其配稱我對的理想軍人。當時我對這些人的頌揚，對堡壘守軍的讚美，到今天我也不覺得是過分。我認爲這些人們的品格和愛國熱誠永遠值得我們的讚美。後來，馬其諾防線雖然很快的陷入敵手，卻不是由於這些守衛的戰士們的過錯。馬其諾防線的美滿，使我們考慮到一個問題：那些賢明的政治家們拿出大量的金錢築起這條並不完善的防線，這不知用這些錢來裝備起一個無敵的軍隊。但是，馬其諾防線的命運並無損於那些戰士們的光榮。

一九三九年的聖誕節，處於一種使人感到極端愉快的風力之中，我在森林和英法軍隊們一起度過了佳節。在英國是找不出比此地更能讓人感到節日歡樂的地方。一陣白霧籠罩着這一帶的風景，造成了一種神秘的意境。眼前顯不出五十碼遠，但覺得像一簇小的圓圈裏都是仙境一般的。每一株樹，每一個窗戶，每一片葉子，都帶着一種發光的瑰麗。就是那些石頭，也如莎士比亞故事裏點化了的怪物一般，變作老人樹上一些發光的靈

層層裝飾起來了。在居民已稀疏散一空的小村裏，潔白的雪花使那些已經死去的家屋又蘇醒過來。一家無人的旅店的前面有兩株月桂樹，上面散佈着一些光芒的水晶，像是無數顆鑽石鑲在那上面。每一個樹叢都變成一個搖籃，每一個樹林間的空隙都好像一座白大理石的教堂。道路上，英法的士兵們在酷寒中抖擻起精神，在薄薄的冰層上滑行着，彼此交換着快活的祝語。走近了前線，四週是無限的沉寂。沒有槍砲的音息，也沒有語聲和喊叫來打破這種使人迷戀的意境。在荒涼的農場裏，聽不到狗叫，聽不到羊鳴。霧，給對面的防線戴上了面具；用燦爛的枝葉鑿成的銀樹圍繞着每一個士兵。真的，在英法士兵們的一生當中，這一戰時的聖誕節即使不算最快樂的至少也是最美麗的了。

在這條防線的其他各點上，我也看到了許多可欽佩的軍隊，尤其是普理奧（Primo）將軍所統率的機械化騎兵師。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參加他的一個騎兵團的檢閱。啊，多麼優秀的士兵啊！他們的步伐矯健而有力，走到司令官的前面，一致的向左看，目光注視着他，表現出一種少壯而悲壯的精神。真的，就是近衛軍也不會比他們再好的。

但是法國將領中的一些有心人常對我談起撥興的話。一天晚上，北非陣團的司令告訴我，他希望和平談判的實現。

他說：「德國軍隊的人數超過我們很多，裝備的優良更是我們所望塵莫及的。我的士兵們的英勇不下於任何軍隊，但是沒有戰車防禦砲，他們也不能赤手空拳來抵擋敵人的進攻。」

一九四〇年三月，我在季洛特將軍的司令部裏住了兩天。季洛特是一個優秀的將領，在法國軍隊中有很好的聲譽。他曾從德國經過比利時逃回來，喬裝為各種各樣的商人，終於到達我們自己的防線。這故事被人們繪聲繪色的到處傳述着。在康洛哥，人們把他看成一個人溫文而有風趣的人，但是他的大胆使他的上司們吃驚，司令部裏總有些擔心他太超越了自己的職分。在以後的戰爭裏，統帥部委派他在佛蘭德斯一帶的任務，極其適合他那種特殊的氣質。他的部隊担任流動翼，任務是在德國侵入北國時突擊到不列達（Breda）。

在巴黎，在訓練，我極常看見他，身姿很高，穿着一件長長的淺色外衣；但見面時除了寒暄之外，我總未得機會和他談話。在我同他相處的幾天當中，我很想有機會同他詳細談談。

他並沒使我失望。許多軍人們在談話時都是這份的小心，對於自己所受委的任務的見解，總要先用略略的辭句來辯解一番。亞登將軍則不然，直言快語，很利索地就

說。

他說：「在軍事當中，我們非冒險不可——當然只許着合理的冒險。同一班人務所辦的完全相反，我並不是冒失鬼。但凡是當過考員的大胆是必要的。你別忘記一九一八年亞登將軍（Villars, Doterreis）進攻德軍的故事罷。當時我以師部參謀長的資格，奉命把本師準備起來，開始進攻。當時我們必須以確實而神速的行動來奇襲。這樣，第一的辦法就是在一個很緊湊的陣線裏把我們所有的迫擊重炮集中起來。一師八臺在一起，每十碼的間隔有一輛坦克，危險性當然很大。一旦炸彈落下，就要全軍覆沒了。但是這種炸彈的

可能性很小，因為前一天晚上敵人不會得到情報。推斷結果，認為這是個合理的冒險，我幹了。那天早晨我的心跳得很急。我們要在上午四點三十五分進攻。從三點鐘起，我就不斷的看着錶。四點半到了，沒聽到一聲槍響，我鬆了一口氣。……四點三十一分……四點三十二分……四點三十三分……四點三十四分……四點三十五分，一聲令下，全師出動，我才長長的喘了一口氣。……」

後來我們談到英國人時，他又給我講一個故事。他對英國人的性格甚為讚美，但是認為他們的遲緩太耽誤事。

「在戰爭當中，」他說，「動作敏捷置於一切。在摩洛哥戰役中，我必須進攻一個村落，那個部落居住在一個幾乎無法到達的山頂上。我把工兵司令請過來說：「你看到那個陡峭的山嶺嗎？……我限你三天工夫，開闢一條道路，要能使汽車直達山頂。」他很有禮貌然而很堅定的回答我說：「先生，這是不可能的。像這樣一件工作三天完成不了，需要三個月。」我說：「好罷。既然不可能你就不必作了，讓我自己來作。」然後我把軍部

一個上校找來，起草了一個極其詳細的計畫。我讓他把他的部隊以及所有在電在附近的兵團都動員起來，修築道路，在三六之內應是完成。……到時候果然完成了，……我就向敵人進攻，他們沒有預料到而且也無從預料到，只有束手被擒了。這件事情給我們一個教訓：襲擊的要訣就是來作而且儘速作似乎並不可能的事情。」

自然我又問他這次戰爭的發展趨向。即使是三洛特將軍，也認為在一九四一年以前我們不會達到主動地位的。

「這是一個最使人抱憾的事實」，他說，「但是我們什麼都沒有……航空機，我是一軍的司令官，你知道有多少架飛機可以聽我差遣？八架。只有八架！當然我們更有優秀的皇家空軍，但是如果我想用它們為我作一次偵察飛行，我得先商請喬治斯將軍、喬治斯將軍得商請甘末林將軍、甘末林將軍得問巴頓特司令，巴頓特司令得問勃勒特爾司令，勃勒特爾司令才能下令起飛，到那時候已經失卻時機了。」

「如果德國發動攻勢侵入比利時呢？」

「那樣，我們只好今年就開始作戰，但是我們的處境一定是不利的。」
同他坐在一個車子回里爾去，他談到他的兒子們的教育，以及生長在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裏對於他們的性格可能有一些不良影響。

在德國容許我們加強戰爭準備的八個月期間，我們會怎樣利用所有的工業呢？情形壞得很。此中也有幾項理由：

第一是軍需處執行工業動員的冥頑不靈。熟練工人是製造飛機大砲不可缺少的，都已被派到地方軍營裏去作掃院子或剝馬鈴薯皮一類的事情。要把這些人集中起來，送回各自的工作崗位，總需要幾月或幾年的時間。例如，當諾特工廠平時僱用三萬以上的工人，對於坦克車和卡車生產可有很大的貢獻，在戰爭爆發時，人數卻減少到八千到六千之間。真是咄咄怪事。

理由：當國家和財源家們認識到這戰爭溫和和上次大戰時，因這所有的財源

都趕着四五年的戰爭來準備的。結果，一些工廠到一九四一年或一九四二年才能獲得有數的生產。因為不能充分利用法國的機器設備以及有目前經濟的重要，於是取得美國去訂購最新式的機器工具，處理我們在美國訂購的不想這是這些，而應該是坦克車和飛機。英法把所有(的)剩餘的黃金存滿的又記開，分成了五份，規定每半用去一份。美國大工廠很可以如期生產出我們所必需的重武器，卻收不到同盟國的訂貨單。『法國製造的器械便宜些』，人們這樣說。殊不知這就造成了我們在戰爭上的一切損失。

第三個理由：他們所準備的是一場永遠沒能實現的戰爭。參謀本部決定猛進攻西格弗利防線作長期的準備。他們異常精確的計算出來，為遠程進攻需要若干重砲，於是積極準備，然而同時我們有比這更迫切的需要應該以全力求得的——戰車防禦砲，高射砲和機關槍一類的輕武器，卻都被忽略了。德國的巡邏哨都帶着輕機關槍，我們在薩爾一帶的巡邏哨也向長官要求發這種武器，但是我們就沒有輕機關槍發給他們。當德國開始應用降傘軍部隊的時候，上峰命令所有軍官都帶手槍，但是法國連手槍都沒有了。我本人曾在幾個鄰

市裏（巴黎也在內）想買一隻手槍而不可得。後來，直到六月初，法國才到意大利去訂購手槍，然而為時已晚了！

第四個理由：士氣不振和政見紛歧，對於生產的阻礙很大。從威德互不侵犯協訂簽訂的時候起，無黨派共產主義者工人們，雖未表示公開的反對，卻在無精打采的作變相的怠工。小資本的僱主們因為得不到利潤，也都有些沮喪。一九一四年時，小工廠都忙着製造砲彈，這次戰爭裏完全看不到那種情形了。

一九三九年十月，雷諾（那時的財政部長）在一天晚飯後想到巴黎附近一些軍需工廠去看看。到的時候看見工廠都關着門，他很覺驚訝。原來這些工廠都不作夜工的。第二天，他去見達拉第。

「你曉得嗎？」他半玩笑的說，「如果照這樣下去，我們非敗不可了。」

他以為這樣的說法未免去事實太遠，當時我們大家也是這樣想。誰想這樣的說法太中實際了！

陶特瑞 (Raoul Dautry) 就任軍需部長以後，軍需工業界一切都大有進步。他是一個優秀的工程師，在上次大戰後改建了法國的鐵路。但是他被任命得太遲了。政府在一九三六年就應該派他來負責軍需工業。陶特瑞是我所敬重的人，和我同是李奧蒂的朋友。他為人短小精悍，在談話的時候，總把左眼半閉着，很機警的打量着客人。他對於以前作過的任何職務都很有成績。每當有人問他作事的秘訣時，他總要說：「我有一個妙訣，就是——幹。」

在皇家飯店內辦公的軍需部裏，天剛一亮，陶特瑞就忙着在紅紙片上給他的各部份負責人下緊急命令。這些人上班的時候，就會發現部長給他們下的紅條在桌上面放着，而且必須在當日作覆。簡短，急莽，有時幾乎可以說是粗野的，這種紅條子已出名了。下面是幾個例子：

「各工廠經理，近來本部各員多行遲到早退，殊屬非宜，本部即將制定一組規則，以

「A君：我知道現在天氣很好，我也感覺到熱了。但現在吾人正在作戰，X少校何得口啣雪茄，倚窗納涼，垂簾糾正之。」

「B君：在工人們有空閒的時候，即應督促他們感飾物品，搜集廢鐵，掃除陰溝或修平道路。不可使任何人優遊無事。管理員的職務就是管理旁人。」

「某工廠主人：法國所有機器皆應工作二十四小時，此雖困難，然屬必要。此外諸事，皆微末不足道者，吾不置意。吾人需要一切並立即需要。其目的在儘速取得勝利。其手段為完成一切不可能的事情。」

陶特瑞的治事法則就是這樣，如果確會有人能把法國實際推動起來的，這人就是陶特瑞。然而，像他那樣一個精力充沛信念堅強的人，在和我單獨會談的時候，也表現出了心緒不甯和悲觀的意味。

「你什麼時候才能把法國軍隊必需的一切全給他們呢？」

「必需的一切嗎？非到一九四二年以後不可。」他回答說，「我們準備得太遲了。」
「他是一個勇往直前硬幹到底的人物；但是德國已先着手了好幾年，他也是個凡人，不能創造奇蹟啊。」

一九四〇年一月，法國當局派我去考察英國本部備戰的情形。英國派北海艦隊把我載到目的地。他們領我去參觀航空學校，軍隊訓練營和製造飛機大橋的工廠。海軍部的一切措施都好。空軍雖然數量太少，大致也是很可欽佩的。至於陸軍呢，連法國陸軍考察團對英國在訓練中的軍隊的數目都不能探聽到任何情報。我對一個在陸軍部招待我的軍官說：

「先生，據你對我說，英國的現役軍隊，第陸軍和地方軍隊的總數約七十五萬，此外還有已經應徵的新兵六十萬。很好，但你們為什麼會連三四十師的軍隊都沒有呢？」

「這些事情我並不清楚。」他回答說，「負責任的人今天不在這兒。」

那天晚上我在國會裏遇見倍里廈，他剛剛辭去陸軍大臣的職務。

「你對於我們徵募的新軍隊有什麼感想呢？」他問我。

「在我看來」，我回答說，「他們的素質都很優秀。但是數目未免少些。」

實際上，除了加拿大團之外，我們就有不到有一營以上的隊人在訓練中。教練步兵的都是些老年的上士，所教的無非是怎樣應用刺刀。在現在的戰爭當中，這還有什麼價值呢？在戰軍學校裏，教法都很新穎，但戰軍的數目太少，而且都已是「過齡」了的。對我極遇到人們的善意、幽默、關心以及令人不敢輕信的勝利的保證。

在英國的時候，我出席一次下議院的議會，那天辯論的題目十分鄭重。反對黨要求在內閣裏加一個大臣，專司經濟問題。政府答覆說有財政大臣西門就夠了。別人很難想像在這種場合下還要彼此更換快意的笑話，但事實上他們是這樣的。莫理遜和阿特里，代表反對黨發言，很有禮貌而溫和的諷刺着。西門在爲自己辯護時，對他們表示着謝意。他說他們的溫文有禮的態度使他想起了溫爾頓 (Francis Weldon) 在「善釣者」(Complaisant Angler) 一書所說的一句話，「對待你的虫子，要像是很愛它一般。」

然後就有一個反對黨議員站起來駁正。他說：「『善的者』我記得爛熟，原文並不是：『對待你的虫子，要像是很愛它一般』，而是『對待你的魚，要像是很愛它一般』。」西門又說：「這位可敬的議員是對的，但是我認為『你的虫子』更有趣味些。」全場都同意他的話。於是他附帶說參加這種性質的辯論在他是很困難的。這使他想起了有一次首相主持樞密會議，那天的議程是「正統教派的英國人有勉強信服來世懲罰的道理嗎？」一位著名的神學家提出反對。他說：「今天首相在我們面前來決議這個問題是不公平的，因為他本人對這問題的態度過於明顯了！」

首相坐在西門的旁邊，也高聲大笑，全場對於首相的快意和西門的機智都感覺快活。顯然的，下議院的議員們認為某些快樂的發洩對於他們的精神健康是必需的。

一九四〇年二月，我回到阿拉斯時，聽到高特將軍的參謀長作出如下的漂亮演說：

「在冬季的幾個月過程當中，我們已經獲得了確定的勝利。我們把現在的情形同去年

八月底的情形比較一下，就可明白。去年八月底：我們都認爲不僅要對德國人作戰，而且要同時對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作戰；我們不曉得美國是否能撤消軍火出口禁令，不曉得屬地是否能擁護我們，阿刺伯人是否要站在和我們相反的立場。到了今天，意西日三國都在中立，美國已撤消軍火禁運法令，屬地都擁護我們，連阿刺伯人也同我們站在一起了。此外，再把法國的動員實行以來毫無阻礙，和敵人在西線的閃爍已不可能的事實合起來觀察，我說我們已獲得一大勝利，似乎不算誇張。

對於這些論調，當時我很難置辯。但是有機會觀察過兩方陣營的人並不持着這樣的見解。中立國的人們已不再相信我們會勝利了。例如，意大利在戰爭開始時持着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雖然墨索里尼很顯然的偏袒德國），到今年二月，就認爲同盟國完全浪費了冬季數月，交戰國雙方力量的不均衡不但並未減少，反而增加了。一向在意大利廣播電台用法語作柔媚的談話的女人，突然開始訕笑，終來竟公開的露出敵意了。我的一些接觸過意大利人的朋友們都報告來一些兇惡的預兆。

「我們再會罷。」意大利人范爾波贊我的朋友李奧諾這樣提示過，「你們將來所要遇到的砲火洪流不是你現在所能設想得到的。你們會沉淪其中的！」

這時意大利的決策已定，只是在等待着有利的時機。

我們是合把這八個月的期間完全浪費了麼？如果乾脆說「是」，對於那些在薩賓區盡最大努力作戰的軍隊，對於那些辛辛苦苦苦挖土和泥的英法士兵們，對於那些費盡心機偵察制敵的參謀本部的人員們，都是不公道的。其次，從去年九月到今年五月的期間，有許多英法人們在艱難的努力工作着，但是他們大部分的努力都獻擲於無用的任務上了。負指揮之責的人們都誤於下列的三種觀念：

一、可以像一九一四年那樣死守防線，因此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防線，然後用全力據守。

二、聽其波蘭的教訓不適用於法國，所以必須採取新的原則把我們的軍隊重新訓練，重新裝備。

三、認爲這次戰爭是一個長期戰爭。所以一切工礦和財政的準備都是爲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的戰爭的。

在這些錯誤之外，法國方面因其國內政見紛歧，英國方面因爲過分的自信和樂觀，都對於戰爭普遍的缺乏熱誠，看清楚這些情形，自然就會明白爲什麼英法在作戰八九個月之後，就不能再抵抗第三帝國七年以來苦心孤詣清盡鍊成的突擊力量了。

三 人事摩擦與戰局

領袖們的摩擦，貽誤了戰局和國事，是歷史上常有的現象。在一九一八年，法國很幸運的有個偉大的領袖，能夠壓制住一切阻礙他作政治活動的人；那就是克里蒙梭。相反地，在一九三九年的戰爭中，達拉第和雷諾總是爭奪政權；所以他們的互相仇讎，確是戰局慘敗的一因。在英皇喬治第六於西明寺（Westminster Abbey）行加冕典禮的那天，當當請走進禮堂的時候，一位坐在我旁邊的英國官員，轉過臉來問我：「那個矮小而又有日本人面孔的人是誰？」

我答道：「那個矮小的人是將來的法國總理。」

自從他和我太太的朋友，一位名律師的女兒，蘿波特（Jeanne Henri-Robert）結婚以後，我就時時關懷他的遠大前途。我認為他是一位最智慧而最勇敢的法國政治家。在許多場合，我曾見他很不自私的擁護他的選民們所討論的主張。當英鎊跌價的時期，他獨敢先

提議實行不可避免的法郎貶值。在我們的政治家中，惟有他

摩達高樂將軍的體

軍機械化方案，而發起建設強大裝甲師團的運動。惟有他當法國

前途的時候，出

版一本討論政治的書，取名：「青年，你們想要什麼樣的法國？」

當戰爭將要爆發的時候，在使人悲觀的財政情形之下，他接任了財政部。他竟能於幾個星期之內，將幾萬萬金法郎收入國庫。我愛他的那種神氣：當某件事情引起他的思想的時候，他馬上就站起來，把兩手插入衣兜，脖子向後一挺，矮小的身軀伸得很高，使用緊促響亮的聲音，講些生動刺人的語句。我們常叫他「小鬥雞」。我們希望他能為正大的目標而奮鬥。

但是，他的辯論天才，傲慢的自信，刻薄而漂亮的理論，和對於經濟財政問題的旁若無人的神氣，激怒了許多政治家，特別是達拉第。

達氏的口才，也像雷諾那樣流利。不過，他的風格不像雷諾那樣盛氣凌人，那樣鋒芒畢露，那樣吹毛求疵。他的言辭，很通俗而含着悲憤的情緒。當達氏對法國人民講述戰局

的時候，一般小販，工人，農夫，每個人都覺得他的親切的口吻，沉重的語調，和他衷心的愛好和平，真配作法國人民的好友。

達拉第曾當過歷史教授，他本來居心忠誠，再加以從事法國歷史的研究，遂有了盡忠祖國的深刻認識。這都是令人欽佩的美德。可惜這些優美的品質，被兩個很大的弱點玷污了，疑慮的性格，對同僚易起猜忌，而浮動的意志，有時變成病態。時常一陣一陣的暴怒，發脾氣的時候，就大拍桌子。他的同僚們認為他的舉止，是虛張聲勢，都說他色厲內荏。但是，達拉第的本性，一般人是不知道的。他們只見他的短小精悍的外貌，就稱他是卡馬克的野牛（The little bull of La Camarque）。而希望他能有勇猛的行動。

「誰是繼任達拉第的理想人物呢？」一天我問雷諾。

「還是一般法國人想像中的達拉第啊。」他回答。

愛德華·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的猶疑性格，使他和愛

德歐（Edouard

Herriot）結合一起；而兩國兩個愛德華的衝突，急進黨早就解釋了。墨斯坦（Mestral）

自己的喜劇裏，有一個人物，他的朋友們管他叫「三隻爪」(Three Claws)。這位先生，對自己的事情，總是猶豫不決，甚至在他結婚的那一天，還猶豫着是否到教堂裏去行禮。雷諾常說：「達拉第是三隻爪。」正因為他有「三隻爪」的猶豫性格，這位急進的部長，才把組織人民陣線，而保守的布爾喬亞也對他抱着希望。

達拉第常說：「雷諾一說話，就現出自滿的神氣，爲忍氣起見，我只好把他看作和孔德的燈示尾巴一樣。」

必須站在同一陣線，而負起支撐法國危局的責任者，就是這樣的兩個人啊。實在的，甲攻擊乙，乙誹謗甲，先是互相鬥氣，漸而變成仇讎，而枕邊謔言更使其關係惡化。

這些以法國爲主角的悲劇中的瑣事，我本不願敘述。但一方面因爲重要的事件，已是人所共知，而另一方面因爲我們幾個政治家的私生活，的確影響了他們的公務。若謂一九三九年的法國生活方式腐化，那是大錯而特錯的。法國的一般人民都過着簡單規律的生

活。可惜 巴黎的上流社會的人們，却過着正如拜倫所說「因為他們睡覺晚，就自信他們是世界上的領袖」的醉生夢死生活。這些人們，認為沉溺荒淫無關緊要；然事起却證明了荒淫的生活會把國家陷於危險境地，而凡欲為領袖者，必須是先把自已訓練成爲能制慾的人。

達拉第在他的太太死後，重娶馬桂詩 *Marquise de C.* 爲他的虞姬瑞 (*Cléopâtre* 羅馬神話中好進言的女神——譯者) 這位玉顏，金髮，溫柔的美人有權位的慾望，和政治經濟的興趣。但她知道如何在後台操縱，而不顯示她的才幹。所以大體看來，她的賢淑活動，並沒有很大的損害。相反的，雷諾的女友皮伯爵夫人，*The Comtesse de P.* 是個敏銳，浮躁，好事，而行騙危險的人。

一天，我在雷諾面前，批評達拉第所任命的某一入選之不當。

「那不是他選任的嗎。那是她的意思啊。」雷諾接着說。

「那也是不可原諒的，」我說。

他歎一口氣。

他說：「咳，你是不知道的。一個勞苦一天的男人，爲得一夜的安息，甚麼都可忍受的啊。」

我相信巴爾札克（Balzac）早就說過那樣的話。

從戰爭一開始，皮夫人最顯著的特點，似乎就是她的勃勃的野心。她不滿意雷諾只作財政部長，她決心無論如何要使他作總理。她設法使巴黎的社交場充滿達拉第能力不夠的評議，同時款人人都覺得應當趕快讓雷諾來繼任。自然的，這些閒話，當晚就可傳入達拉第的耳朵。於是達氏對雷諾的嫉恨越來越大了。有一時期，這兩位戰時內閣的關員，因爲彼此仇視的態度過甚竟至不能互相接談了。這真是一個可笑又可怕的局面，而對國家則充滿危險。

我是長在軍營中的人，我經過巴黎的時候，最喜歡拜訪雷諾。他能用很漂亮而肯定的方式，告訴我一些政治的情形。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正是議會休會的期間，我請他親

我讓吃飽。那天早晨達拉第內閣的不幸的日子。那時的失敗激怒了全體議員。大家都反對達拉第的行動遲緩。大概這些批評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那時候組織遠征軍是很困難的。或者是不可能的，甚而結果至於失敗。但是議員們要求開秘密會議。會開了一下午，並於當晚十點鐘又重開一次。

當雷諾於晚八點到我家的時候，他對我說：

「可憐的達拉第已到倒臺的日子了。今晚他的倒台，恐怕是意料中事。」

「那麼，誰能繼任呢？你嗎？」我太太問。雷諾回答：「全要總統和打倒達拉第的人們的意見了。」

我說：「你若當選，你須設法得到達拉第的擁護，他在國內還有很大的聲望呀。」

「那是因為國人對他認識不深刻呀。」

「或者是那樣，但請你不要忽略現實。你雖有才幹，然沒有黨羽。急進派員們仍忠於達拉第；連你所屬的右派恐怕也要拋棄他。因為你與他的觀點不同，並且隨便的談話影

他侯著說假想總統命他阻攔。他必盡力贊成拉第留任國防部長。在十點鐘，他到卜第與拉去（Mr. W. W. W.）。那天晚上，果如他所預料，拉第第的內閣倒了。勒伯倫總統召他，他馬上就受命組閣。但是，在這龐大巨工作中，這位很聰明的人，意外的顯出來他對民意的認識不足，和極端的缺乏直覺。於是我就對他担心了。他雖然是一個理論家，而對於現實則太隔閡了。他是一個不憚人情而難在理想中透活的人。他所組織的內閣的大事情形，很容易使急進派和溫和派聯合反對他。不錯，他得到達拉第的支持了；可惜是一個有積恨深仇，兩決心相繼拆台的達氏的擁護。因為他在這個舞台上，是個無實權的傀儡。當他出席議會時，需講經過很大的困難，才得到「一」票的多數！議員們對他的組閣並不歡迎。而對達氏的倒台，還在惋惜。雷諾感到這種敵對的空氣，也失掉他一向的自信，很沮喪的講了幾句話。

次日，我返回阿拉斯原防。我發覺所有我國的同志，都深刻的對於雷諾內閣的組織表

示震驚。他們認為這是有意的違反公意。在戰時，政府者和大部分人民分裂，確是個危險現象。自雷諾作總理以後，我就沒有看見他。我乃在從阿拉斯給他的賀信內引證巴雷斯（Barres）一句話：『代表國家的，在平時是議會，在戰時則是軍隊。』並且加一句：『不要和軍隊隔離呀。』

從戰事一開始，雷諾就對甘末林有敵對的表示，雷諾不但責甘末林不體權職，並囑軍隊對他沒有信仰。我對這些問題，很難表示意見。實在說，在一九三九的九月，甘將軍對西格弗里德防線未能作猛烈的進攻，而僅在薩爾區小心翼翼的活動。反對他的人，都認為當大部德軍正在波蘭打仗的時期，是最好的決戰機會。甘將軍說在戰爭起始，我們就沒有進攻的裝備，尤其沒有飛機和重炮。沒有那樣的裝備，如果進攻，結果一定是失敗的。

甘將軍曾說過：『我不能在戰爭一開始，就用凡爾登（Verdun）決戰的戰略。』他又詳細解釋他的話：『法國是個人口生殖率較低的國家，且在上次大戰，遭受很大

的犧牲。法國民族再受不起流血的戰爭了。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法國只打丁科舉式的戰爭，一切都預先準備完全，幾乎不受任何損失。」

我承認，在那個時候，我認爲他的主張是很聰明的。我這樣平凡的人，對甘將軍的軍事才幹加以評判，真是一件愚癡的事。在瑪侖戰役中，（The Battle of the Marne）他曾任霞飛元帥的參謀，而且是發明致勝戰略的第一人。他曾是參謀本部的模範軍官，後來在戰場上，也是個可欽佩的師長。

當你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你一定對他的深沉態度，表示驚訝。他的短硬的鬚鬚，小小的眼睛，薄薄的笑唇，顯出一種難于捉摸的樣子。他既沒有福煦將軍（Foch）的豪傑氣神氣，也沒有霞飛將軍的敦厚態度。他不常說話，平時我曾見他終席不出一語。但是，他是一個淵博，禮貌而謙遜的人。參謀本部的官員對他都有深厚的威信。我自己也總覺得他是個很和藹可親的人。他初次到高特將軍的司令部時，他看到我穿的制服，就對我說：

「啊，你這樣的年歲，還是個中尉嗎？」

「將軍，從第一次大戰結束後，我就當中尉啊。」

「二十年沒有陞級了！」他笑着說。「太久了。我提醒你做上尉。」

他二次回來時，我仍然是個中尉。他覺得奇怪。「爲什麼呢？」他問裴特那上校

(Colonel Patton)。我曾叫你向國防部打電話，把莫洛亞提升上尉。」

「將軍，我已辦了。」上校回答。「但有一個困難。按規章需經過兩期的訓練，而莫洛亞只受過一次。」

於是，甘末林將軍轉向高特將軍說：「事事都有困難。我想一個總司令提升一個上尉，不應當有這樣的麻煩啊！」

在我提升以後，他給我一封熱誠的信。「畢竟提升了！但是在這樣晚的時期，我幾乎不敢慶賀你了……」並請我到芳森別墅 (Chateau de Vincennes) 的總司令部去會他

。我還記得很清楚那個在一間拱形的大廳裏舉行的宴會。到會的人，除甘將軍的參謀外，還有在北非指揮法軍的諾格斯 (General Zore) 將軍，和駐尼斯拉夫的公使勃魯斯

生 (Mr. Brugere)。

談話都是關於公務方面的。諸將軍討論關於他的部隊的軍需問題；勃公使談論南斯敏夫在法所定購的軍火，簽訂合同以後，法國迄未交貨。甘將軍對他兩位的問題，都予以很扼要的，清楚的，正確的答覆。給人們一個很好的印象。他向我詢問將要關住薩爾的英軍第五十一師團的情形。又談到法國學院 (French Academy) 和它正在編纂的字典。於是

他對我說：

「此次參戰的軍人應當取其麼名字。一九一四年的軍隊自稱「小兵」 (Boles)。但一九四〇年的軍隊還沒有命名呢。」

勃公使問他德軍是否就要進攻。

他說：「是，一切都在準備着。我們的飛機和祕探都見到德軍的各種準備情形；火藥的集中，軍火的堆積和平民的撤退。當然，這也許是個詭計。但昨天戈林的演說，已預示戰爭的重要發展。戈林一向在公衆面前的演說，大都講的是實在事情。大概，總攻的時機

微進退了。

他對敵人進攻的沉着態度，使人甚為安心。我們看見他，總會生出一種驚駭，因為他仍然健在的理想。但雷諾並不抱着這樣的意見。

雷諾問：「為甚麼要兩個總司令呢？如果喬治斯將軍（General Georges）指揮我們的軍隊，甘末林將軍最好專任參謀總長。

總理和這位總司令的摩擦，不僅由于個性的不同，而多由于作戰的主張迥異。從戰爭一開始，甘末林就主張採取防守戰略，再相機進攻，而雷諾則希望採取主動的戰略。

雷諾說：「一味防守的將軍總是失敗的。」

自主張加緊進行戰爭的雷諾，作了總理以後，他覺得須來一下驚人的戰略。然而可能性是很小的。從他第一次去倫敦的時候，他就主張英國應當在挪威領海內敷設水雷障地。後來，他又從外交部的文卷裏，提出一件擬定的英法協定，那上面規定着雙方都決不締結單獨和——這個計劃是達拉第始終不同意的。後來他又提出比利時的問題；進兵比利時

獲得比政府的承認，是必要的嗎？雷諾想要強迫比國參戰。

他問比利時的各部長說：「你贊助那方面呢？如果幫助我們，你們就應當積極的與我們合作，在前線上佈防；如果反對我們……。」

甘末林將軍很坦率的反對這種態度。他恐怕這種辦法能使比國的二十五個師關連到敵人方面去。這兩位要人演了一幕劇烈的爭論。若不是達拉第以辭國防部長來要挾，雷諾在四月間早就想把甘將軍免職而任命喬治斯將軍了。這件事情，雷諾當時是不敢冒險的。然而，他的地位近來似乎穩固了。納維克（Navin）海戰的勝利，在法國發生了很好的印象，而設計挪威戰略的雷諾也得到很大的聲望。四月二十日，他對議會報告說：「堅固如鐵的路線已經被切斷了。」幾天以前，擁有一票多數的總理，得到全體一致的擁護了。擁護者是個可喜的現象。然而那天晚上我遇見一位議員，冷笑着對我說那算不了甚麼。

他用傷感的語調對我解說：「你是不知道議會的丑戲呀。雷諾的政敵們煞費苦心的才得到一致投票的局面，因為一致的投票是表示全國一致的愛國行動，而得到絕對的大多數

的罪，才表示個人的成功啊。」

次日，雷諾自己接見我。在他的辦公廳裏，倉皇的來回走着，雙手插入衣兜裏，高聲對我談論他發現我們軍備的空虛情形。使我憂心如焚。

他說：「我們的坦克只是紙老虎。因為一切秩序的紊亂，庫中存着的大炮和機關槍都沒有用處了。德國有二百個師團，或者是二百四十個師團，而我們只有一百個師團啊。達拉第的惰性阻礙了一切的改革，而使政府無能為力。」

「雖然，」我說，「達拉第的確是個愛國的人。他常有很流利的播講，而且很盛感國難。」

「是的」雷諾說「我相信他希望法國勝利，但他更希望我失敗呀。」

一個該人的武斷。這種坦率而不公正的話，正可顯出他們二人間的鴻溝。

五月廿四日，我及雷諾會談一次。我發覺他很懊喪與煩燥。在他的辦公室裏，擺着三個

話，一架通到內閣，一架通到外面，一架接到皮夫人的房裏。最後的電話機不斷的響，雷諾拿起耳機，聽一會就怒氣昂昂的大喊：

「是……是……當然囉……但是那已經明白了……但是我要求你讓我安心工作……」

最，後他不答了。

挪威的情勢，愈形惡化。這才發覺德軍裝備的優秀而是不可抵禦的了。把敵人的周密
的準備——各種極細微的動作都預先演習得很好——和我們的臨時抱佛腳的辦法，竟讓勇
敢而裝備不好的軍隊，甘受敵機的轟炸和掃射的情形比較一下，即使最樂觀的人，也得垂
頭喪氣了。

雷諾把這種因無準備而遭慘敗的責任，推到他的政敵身上。

「他們瞞哄我，」他說，「特別是達爾朗（Darlan）海軍大將彼達威學國難的信，都
不讓我看到。如果看到，我也許不冒險了。今天下午我要到上議院的常務委員會去，把內

幕完全講出來。」

在這危急的時候，德拉第和雷諾的口角更形劇烈，甚至於勒伯倫總統還得出來調停。

次日，我到法國學院去，那裏每星期四都有聚會。他們正照常的講着字典。Aiguiseur

「磨」這個字，無異議的通過了。Aiguiseur「磨工」這個字取消了。而Aile「翼」字的定義，却引了龐納德（Abel Bonnard）和杜漢麥（Georges Duhamel）二人的一場舌戰。第一版說「「翼」是一塊肌肉。」

「那真是笑話。」龐說：「翼不是肌肉：是肢。」

「我和我的意見相反，」杜說：「翼是一塊肌肉。你所吃鰵膀上的東西就是肌肉，確實一點不錯的。」

經過很長的討論之後，雙方同意加上一個特別的註解，「雞腿的翼」（Aile de poulet）。這種時局的悲慘，和註字的詳審的對照，似乎很可驚異。但是，我仍願意看到法國學

院，不顧一切的，照常進行它的工作。假如各國人都是這樣，情勢與現狀就不問了。

五月十日，早晨九點鐘我起來看假日到鄉間去休息。八點半的時候，我開門收書信，正放送荷蘭與比利時被侵的消息。德軍已經大舉進攻了，所有休假的軍官都被召回。於是我就到北車站準備回阿拉斯去。車中擠滿了英法軍隊，只得再掛上幾節車。我看旅行們的心曠神怡，並沒有憂鬱的樣子，反而鬱沉悶已久的局勢的打開，表示痛快。伴送丈夫的太太們，都在站台上等候火車的開走。我旁邊的一位陸軍上尉，站在迴廊的窗前正在囑咐：

「注意，親愛的，把書桌左邊抽屜中的錢拿出來，零票都在床邊桌子的抽屜裏頭呢。汽車的和汽車房的鑰匙都在我屋中的櫥櫃裏的淺盤上面。請你告訴倍慈，把我脫下來的工
作服放點櫃裏。吉安的自行車上油了嗎？已竟有摩擦聲了……。你方才說甚麼？兩天的工夫是太短嗎？真的。但這兩天也許是難得的啊。如果我們把這些暴徒打回去，此次也許是戰事的結束。」

他的年青太太現出興奮的微笑。如果說在敵人進攻以前士氣就很壞，那確是不對的。上層和消息靈通方面或者是那個樣子。但是一般人還是充滿希望。因為無線電每天要放送八次興奮的廣播。

德軍突破色當的消息，對巴黎居民是個晴天霹靂的打擊。必要時，他們是準備退却的，在一九一四年已經有過豐富的經驗了。但是，他們相信，敵人的進犯，很快地就可遭受截擊的。

五月十七日，甘末林將軍向政府報告說，一支德國機械化部隊正向勞恩（Lorraine）進攻，明天他不能負責保障巴黎了。那是政府的多部會極驚惶的一天。

翌晨，巴黎居民聽說德軍已轉向海邊去了。他們至少還有幾天的寬限。此時，雷諾因時局的嚴重，也鼓起勇氣進行他一向所推延的事情。將他認為應負失敗責任而達拉第最為辯護的甘末林免職，並命達拉第任外交部長，而自己則兼任國防部長。

誰去繼任總司令呢？雷諾雖然很久想要任命喬治斯，但這種選任是最使甘末林痛苦的

因爲他們二人的彼此敵視，正如雷諾和邊拉鐸的互不相容。

一天，一位英國將軍對我說：「他們竟在忙着打自己了，而沒有工夫去打敵人。」權位的更換，應當用和協的方式。這對國家，對軍隊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另一個可能的選任，是在摩洛哥和北非有戰功的諾格斯將軍，在少壯將帥中季洛特（Girard）將軍和洪基格爾（Hindenberg）將軍都有黨派，大家認爲洪基格爾是很有智謀的人，他的部隊會很頑強的抵抗敵人；季洛特是個很特出的領袖，但他那高傲的態度，是令人不敢接近的，況且已作俘虜。於是雷諾決定任近東駐軍司令魏剛將軍了。乃將他緊急的名回巴黎。魏剛曾作福煦元帥的參謀，當一九一八年戰事將敗之際，他能轉敗爲勝。現在最好利用他的經驗。

同時雷諾請貝當上將任副總理之職。

在大多數的法國人民的心目中，貝當上將具有無比的資望。他那端正的面貌，魁梧的身軀，和嚴肅的威儀，令人敬畏。在六名親身參加上次大戰的光榮創造者中，只有他和戴

斯皮瑞 (Marshal Franchet d'Esperey) 只僅存的碩果。八十四歲的耄耋，而精神猶如青年，使人狂笑和敬佩。

雷諾所以任命貝當，原想藉他的巨大聲望，鞏固自己的地位，加強統一民衆的意志；但他發覺貝氏只有虛名以後，他才曉得錯作了打算。他無異給自己找來一位繼承人，一位審判官。

雷諾對達拉第的傾軋，由六月六日達氏的免職而告終結。前數月以威嚴可畏的法團主人，在河灘風潮的旋風中，無聲無息的下台去了。

此時，是甘末林將軍辭職的甘末林將軍，住在福煦街上的一所雅潔的房子裏，房子在廣場和花園的中間。穿着便服，自己正在用打字機作他的日曆錄。

甘氏有一位在掌權時代交誼的，而在下台時仍很忠實的好友，于離巴黎之前，去訪甘末林夫人。她對甘夫人很安靜，很消閒。

甘末林夫人說：「甘將軍正和我住在一起。他並不爲個人的進退着想，而對法國和我們的軍隊則極關懷。他對魏爾將軍表示最高的敬重，且希望他打攔敵人的成功。」

於是她指着另外的一間房屋，（在那裏，我們看過甘末林母親畫的他的兒時像片，穿着長衫，打着小鼓。）她現出賢淑太太的溫和面色。

「你聽到了嗎？」她很感歎的說。

「那是他的小打字機的響聲。」

這些劇烈的人事變遷，對作戰的行動與籌劃發生很大的困難。我們承認：這一類的敵軍行動意見與探報二般社會常常發生的；嫉妒和野心是人之常情；在一九一四年克里蒙梭和普恩加廣（Poincaré）也曾互相嫉恨，但是我們畢竟還是勝利了。懷的，在一九一四年人們的慘迫國是而萌發的強烈的愛國情緒，把那些嫉妒心理都克服了。普恩加廣對克里蒙梭毫無芥蒂，然而他仍與普恩加廣合作。普恩加廣的貝當也在福煦元帥指揮之下忠實的

服務。但一九四〇年的法國：黨派的分裂，權位的爭奪，和公德心的墮落，使人事的摩擦越發劇烈。人事的摩擦雖然不是失敗的主因。（據我們所暴露的弱點，是由於軍事上，外交上，工業上，都缺乏適當的準備。）但是各要人的口角，和缺少統帥全國的領袖，致把轉敗為勝的最後機會失掉了。

四 納粹的閃擊

一九四〇年的五月初，我到法軍前線去巡視高拉甫將軍（General Godeffroy）指揮的第九軍。幾天以後，這一軍在剛烈師團（Paras Divisions）的猛烈砲火之下潰敗了。這軍的參謀部在維文鎮 Verins 的小村莊裏。維文是個古老的小鎮，街道是沉悶的，窗板是半閉着，當軍務員們帶着一些懷從不慌不忙的走向辦公處的時候，這條石子砌成的街道發出清脆的脚步聲。

我到達的晚間，在給我太太的信裏說：「我在此地見到許多好人，但他們似乎有點老邁而頑固了。」

高拉甫將軍是個懦弱的人，但很受長官們的尊重；外貌很是彬彬儒雅，腰部却粗胖得上年時都感困難。他的談話很有趣味，但所談的都是些過去的事情。他對我講，在法更達（Washon）時代，他是個青年的連長，曾參加過攻英之戰。一九二五年，他在摩洛哥捕

德叛徒阿拜爾克姆 (Abdel-Krim)。這一件事是他成功的最高峯，然在今日所要應付的
 匪巨之前，他的高峯也不過是丘垤之頂罷了。

我巡視弗爾姆 (Fourmies) 和夏維里 (Charleville) 外圍的軍隊的時候，其兵額之不
 足，使我大吃一驚。於回到維文鎮的途中，我覺得好幾橫穿一片已被放棄的荒野。當我的
 車經過許多無防備的村莊的時候，不禁想到敵軍本攻的危險；前線一被突破，一直攻到維文
 是何等容易的啊！敵人在城門前能遇到甚麼呢？只是些小孩子都能撞倒的木頭柵欄，一個
 拿刺刀的哨兵和一個醫士。要想以這種防禦力量擋住裝甲的戰車，真是畫餅當車了。

真相是這樣：英法聯軍的裝備，是不夠適應新式戰爭的條件的。這在波蘭戰役中已經
 證實了。實際上，聯軍連普通戰事所必需的裝備都沒有。

我們的軍隊究竟怎樣配備了？因為要防守很長的戰線，最高統帥部想由敦刻爾克
 (Dunkirk) 到馬尼 (Mantua) 佈置一道兵力稀薄的長線。這種一坐長蛇陣是一九一四年

的戰術。那一次的戰爭，所以能夠支持很久，純因敵人沒有能夠攻破我們陣線的武器。而歷史上偉大軍事家造戰術是極大膽的辦法，並且提倡縱深配備。最緊要的還要有機動的預備隊，以便在敵人突破第一線的時候，能夠反攻或補上破綻。

相反的，在一九四〇年，因為我們軍隊的準備太差，我們實際上就沒有機動的預備隊。我們最好的軍隊却配佈於前線上了。假如敵人突破那一條線，我們的後方將要變成一個開菜場了。無疑的，敵人在沿路上能遇到許多城鎮，可是誰能守衛它們呢？

正面攻擊的思想，像一九一四年那樣的，進攻得很慢，一天最多前進幾公里，且易造成許多很容易被攻擊的突出部分——深入每個人的腦海了。所以對杜亞維文，亞伯維爾，亞眠的防禦連想都沒有想啊。守衛這些地方的指揮們，雖然離前方很近，都是些可愛的老者，他們已經退伍很久了，戰爭爆發的時候，又把他們召回，而予以軍人們認為優閑的位置。這些忠厚的老官僚們，雖然提提公文推推，也決沒想一想：如果敵人的坦克車，和帶着機關槍的摩托隊，一旦兵臨城下，將要怎麼應付。

情勢越發的嚴重，因為這些臨近前線的村莊和各鐵路，構成我們軍隊的交通線。英國軍隊的運輸線能利用亞眠，阿拉斯，杜亞，里爾（Arras-Arras-Douai-Lille）路線，或者於必要時用亞伯維爾，布倫（Arras-Villers-Bretonne）路線。但是，假設這些交通線全被切斷，那些軍隊就與他的後方根據地完全隔絕了。我們的綑紮廠，被服廠，軍械廠都在勒哈爾（Le Harve）夏特爾（Chartres）和亞伯維爾等地方。而隨軍的軍需廠又在亞伯維爾，聖保爾（Saint-Pol）和阿拉斯地方。假設敵人突破前線，再切斷軍需廠和軍隊的聯絡，情形要如何呢？很顯然的，在幾天之內，我們的軍隊就要彈盡糧絕了。但是最高統帥部怎樣防止這種危險呢？拿甚麼樣的步驟抵抗由側面來的攻擊呢？簡直毫無準備，並也毫無辦法！

即使想把聯軍的命運在前線上作孤注一擲，這一條線無論犧牲多大，也要保持住的。雖然不很堅強，畢竟還在我們手中啊。三月和四月從英國運來的大挖土機，所挖的戰車防禦溝，比較我一九三九年十月所見的不適用的戰壕好得很多。但是，敵人一進攻，我們就

和他在曠野中那個最劇烈的陣地戰，就耗費八月工夫和很大的人力物力所造成的防禦工事全行放棄，似乎是一件愚蠢的行動。

「在這次戰爭中，誰若先動手，誰就要遭受最大的危險……」，我會認甘末林將軍說過這種話。所以此次拚命的突攻，不是出於本意，乃是迫于政治的緣因。的確對這事也預備了很久；我曾對參謀們詳細研究前比利時進攻的情勢，並且很謹慎的改編行軍的隊形，以便於比王末次陣先一分鐘開到；預料比軍的抵抗，能使我們得到相當的時間去佔由安特衛普（Antwerpen）到納姆爾（Namur）的陣線。李洛特將軍很匆忙的開到不列達去了。德軍現在已經知道當他們進犯比利時的時侯，我們的軍事行動的情形，因為我們已經被誘在敵人的圈線下舉行了一次預行演習了。

情形是這樣：一天，一架德國飛機在比利時境內降落。這架飛機載着德國參謀本部的官員，攜帶着一個在某日侵佔比利時的計劃，他們假裝要將這些文件燒燬，而故意的燒不成。我們馬上得到報告了，英國軍隊立即在第三號的所狀態一會兒又在第二號，又隔一會

在第一號了——最後的意思是準備在兩小時之內要出發的。大軍立刻即開始移動，所有的預備隊都開赴前線。此時，德國的偵察機在高空偵察着，並將情形記錄下來。大概，對於使用那樣最腐朽最明顯的戰略的成功，表示着又喜又喜。

當然的，此時德軍並未來犯，比利時也沒有向我們求援。於是我們的軍隊消耗大量汽油之後又開回原防。但在英國軍官中，只有對德軍情形很熟習的情報局長麥克法蘭（General Macfarlane）將軍，對我們此次的軍事調動表示悲觀，他仍然認為德軍對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的侵略是一定的。

「一百一十個師團的德軍仍在阿克斯（Aix-La-Chapelle）區域，」他說，「他們連個那個地方不是沒有作用的。」

五月十一日，我隨英國軍隊到比利時。這些美麗的城市中，有很多的古老房屋，在塵濺的鄉村裏，有許多女人們站在門口，拿着許多鮮花獻給經過的軍隊。一位英國的隨軍記

者，曾將那萬紫千紅的花卉寫成勝利進行的凱詩，他後來接到報館的來電：「請多來事實的報導，少作些花物的描寫。」他遵辦了。第二天起，花物即行不見，而事實則赤裸裸的暴露了。

比利時的村莊裏，女人們仍在門前站着，他們很關懷的瞧着天空。總機並沒有作大規模的轟炸。一個村莊裏，兩三處房子被炸了。在其他地方，德國飛機的目標原想向交道口投彈，而炸中守衛房了。郊野中的幾所鐘已燒着了，其中有的是修道院和它的禮拜堂。但是我認爲都不算嚴重。我錯了。我們曾經很單純的歡喜，因爲他沒有炸我們的軍隊。我們說：「德國的空軍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的厲害呀。」其實，它所以不炸者，因爲牠想誘我們盡量的深入。我們的深入正合乎它們戰略上的要求。在那個階段，德國空軍的主要目的是恐嚇一般平民。在這方面，果然做得很成功。後來，我們發現每個鄉村裏都有一個第五縱隊的隊員，有的是德國人，有的是比利時人，他們的責任是當炸彈下來之後，他們就對一般居民說：

「趁着機會快逃走罷！不久這個村莊就要全燬了。祕密警察隨飛機之後馬上就來了。你曉得他們怎樣的對待波蘭人！」

人民意識了他們的苦話，恐怖的空氣籠罩了全村，居民們都隨着他們的村長，牧師，官長們逃跑了。馬路上塞滿了難民，情形甚為驚人。在前邊是富人們的汽車，司機們運帶着手套和別緻的小帽；接着是中等人開着自己的車，車棚上還蓋着膠子；並有鄉間大馬車拉着全家老少緊隨其後；還有成羣結隊的騎自行車的人，車架上綁着紅毯子，顯出極貴家歡喜的鮮豔顏色。此外還有極多的難民行列，饑苦的踽踽於大隊之後。

這一切情形，最後有傳佈的，一羣由法軍前線來的難民，連到一個新的城市時，也載起那個城市向波蘭沖走了。我們的機關報無敵，於出報的第一天，隱隱有變遷嚴肅，在波蘭民的法西斯中，紛紛去參差不齊了。其間又有常常喊出立憲口號，因為恐怕攪着逃難的機關。所以一切的軍事行動都不靈了。如問爲甚麼我們不該抓住時機，十之八九都是被擁塞的街道給誤了。

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中向無此種情形，就是在亞眼前邊的陣線已被突破的時候，秩序也沒有這樣的紊亂。爲甚麼呢？因爲現在的恐怖空氣比一九一四年大得多了，因爲敵人有計劃的散放的恐怖謠言，能鼓動一般鄉土觀念很重的人，都要逃避這種難測而可怕的危險；也因爲無線電把這些嚇人的消息傳播到一般農民，他們在一九一四年因爲聽不到這種事情，所以很是沉靜。更因爲德國空軍的數量太大，使這些不幸的人民都有失掉保障的感覺。

要使這些人民不走，而迫他們留居於家鄉，必須地方的軍政當局先行鎮定，絕對不准任何人離開，而且還須表現出防禦的設備。房頂上要安上幾門高射炮，聯軍要有許多的飛機在比利時的上空飛着。可惜這些當局常常被風潮捲走，而高射炮和飛機連一架都沒有。所以充滿恐懼心情的人們只知道往後亂跑，毫無目的，毫無秩序。當成千成萬的難民逃到一個城市的時候，確像一羣蝗虫。

這種可怕的紊亂，已經影響了軍令的執行，而不幸的命運又使命令不能準時發出。在戰爭當中，不僅調換了總司令和十五位將官，就是由敘里亞爾同的魏爾將軍也因遭遇暴風

而耽誤了行程。已該應付過猛烈衝殺的北陸軍隊，是畢拉特（Coburn Pittsford）將軍指揮的，可惜在最緊急的時候，他竟因撞車而斃命了。博爾友德（Coburn Pittsford）也死於此役。指揮，他也是很有才幹的將官，但因和軍隊的聯絡不好，又在最不利於指揮的情形之下，他竟遭受襲擊了。

實在說，當我們想到釀成悲慘結局的聯續的災害，失敗，和致命的擊斃的時候，我們不禁想起古典的悲劇，在那些悲劇的情節裏，命運之神總是用了一串的舉動驅逐天神所厭恨的不幸者走向滅亡之路。

因當德軍突擊色當，和高拉甫的部隊潰敗的消息傳到英軍參謀本部的時候，我也正在部裏。但是我的英國同志——我想是由德軍，或由於胆怯——隔了兩天都沒有把這消息告訴我。官方的公報繼續的謹慎，隱瞞。然而我很容易看出這些事情對我瞞着，且我已注意到

當我進屋的時候，我的朋友們總是把談話停頓。退却令已經下了。最後英國同志才將一

切實情告訴我。此次被敵突破，是很快而且全面的。突破很快的原因，是由於敵人火力的集中，突擊的勇猛和悉佈的戰術。數千噴火的坦克和怪響的飛機，對高拉甫的軍隊一齊加以猛烈的攻擊。無疑的，於此當戰役以前，即使有人告訴我們怪響飛機的情形，我們準不會相信的。因為這不是軍事家的理想，而好像小說家的創造。吉卜靈（Rudyard Kipling）在他的預言作品裏曾經有過這樣的描寫。但經驗却證明了奇怪的聲音和一片熊熊之火混合一起，確是造成了世界末日的幻境。即使最勇敢的人，如果忽然遇到這種威脅，也守不住他們的陣地！

雖然如此，假設他們有制止坦克軍的武器，他們也要抵抗的。請想想，當他們發現槍彈穿不透德國坦克軍的甲板時，他們是如何的害怕呀。斯格達兵工廠（Skoda）所造的鋼板是特別的厚。而這些新坦克軍對子彈的蔑視，正如格里佛（Gifford）輕視小人國的人民（Lilliputians）的樣子。我們的砲兵發射野砲，在通常情形下，可當戰車防禦砲用。但這乃是格宜之計而非有組織的防禦，並且德國空軍與坦克聯合作戰的巧妙，使砲兵

絕無抵抗的機會。

在五月中，大家互問：「德軍怎樣過的繆斯河呢？那些橋樑還沒有炸壞嗎？」英軍中的傳說是炸橋的人被降落傘部隊或是敵人的哨兵殺了，而所用的爆炸地雷又不充足。況且在亞爾丁（Ardennes）地方，比利時的第五縱隊又幫助德國機械化部隊的進攻，所以他們進攻的速度超出預料，而高拉甫的軍隊遭到了很重的襲擊。

在繆斯河上，有一幕英勇的表演。某些英國和法國的空軍，接到不惜任何犧牲要破壞指定的某幾個橋樑的命令後，兩隊轟炸機（英法各一隊）都犧牲了。法國空軍領頭作低空飛行的轟炸，英國空軍緊隨其後。我不知道法國損失的數目，但我確知道六十架英國飛機中，有四十架沒有回來！

這個例子，和其他的英勇戰蹟，證明聯軍的士氣並不為不勇，如說自始就沒有抵抗的決心，那是萬萬不對的。普里奧·法格德（General Fagard）勞倫賽（General Lawrence）和賈森（General Janssen）各將軍所統率的軍隊，仍然是一九一四年那樣的英勇。坦克

車隊，法國騎兵團，坦克防禦隊，以及許多其他部隊都有很好的表現。阿勃瑞（Aubrè）海軍大將在敦刻爾克的防衛戰，能和歷史上任何戰役相媲美。但是僅僅靠英勇的士氣，是不難克服德軍物質方面的優勢的。正如僑一愛健康人們所不怕的病菌，到了因疲勞而致氣力衰弱的身體上便很容易作祟一樣，我們軍隊發現我們裝備不足與敵人抗衡以後，士氣的頹喪就愈演愈下了。

打勝仗或打敗仗全憑軍隊的氣勢如何。我巡視高拉甫軍隊的時候，一位善騎的朱米克中尉作我的嚮導。當我們談到挪威遠征軍的時候，他對我說：

「初次交戰即遭失敗，是不幸的事。一個小島，在試跑的時候，千萬不要失敗。它若失敗，它就氣餒，失了自尊心而認為落後是當然的了。」

馬的情形如此，軍隊也是一樣。勝利的軍隊能夠鼓起勇氣而增加其戰鬥精神，而敗北的軍隊就失掉自信心了。

色當慘敗以後，敵軍所向無敵的神祕迅速的傳遍全軍，而予想要退却的軍隊一種藉口

。在機械化部隊未到之前，敵人的消息，先傳來了。於是嚇得逃散一空；那些軍隊又向西方移動想抄我們北戰場的後路。爲躲避敵人的炮火，我隨從工作的英軍參謀部就向阿拉斯移動。該地充滿了謠言：德軍現到杜亞了，德軍已在喀姆布（Cambrai）了，這些謠言後來都不錯的，可是在那時候還是言之太早。一句家家戶戶傳播的話，就足以使千萬的男女老幼發生騷動恐慌，甚而使軍事領袖們竟下令使其部下退向海岸，等到發現行動錯誤，已陷入重圍了。

德國降落傘部隊在荷蘭比利時確已發生很大的威力，但恐懼心理把他的效力也增加了十倍。在一般農夫和士兵的眼光裏，各種服裝都變成偽裝了，真牧師也疑爲是假牧師，着制服的軍官也疑爲是冒充的軍官，接到真的電話電報，也有懷疑的心理。後來我遇見高達（Jean Cocteau），他用詩人的生動而正確的詞句對我講：「你在馬路上所看到的軍人，都是纏着膠腿的尼姑啊。」

這些比密斯提式飛機（Bristol Fighters）還快百倍的玄術和謠言，就可說明小股德軍

能夠不費吹灰之力，而佔領重要據點的原因了。幾個摩托自行車隊，只要勇敢，裝備得新，就能闖入車站把員工擊斃，而阻止車務的進行。也常有人很能保衛自己。我曾遇到一隊英國工兵師，用鐵錫等工具把進攻的摩托自行車隊全都消滅了。

還有個英勇的例證，那便是担任阿拉斯防衛的威爾斯衛隊和少數的法國步兵；他們表現出來堅決抗戰的成績。我看到在法國軍官鮑密斯（Combes）指導下的威爾斯衛隊沉着備防的情形，城周各入口的機關槍和戰車防輻砲的陣地，都圍以沙袋。德國坦克隊到來時，他們能夠阻止住並能擊燬幾輛，另有許多被擊起了火。敵軍被逼採取迂迴戰略，但仍遭到英勇的抵抗，直到一星期以後，這些衛隊和步兵才很有秩序的退到敦刻爾克去了。

這種優良軍隊，如其數量充足，很能將魏剛將軍所計劃的反攻實現，也能夠將德國摩托部隊所衝破由阿拉斯到巴包梅的破口彌補上。但因難民的紊亂，使部隊的缺乏，敵機轟炸以致交通發生障礙和聯軍參謀部的解體。都足以使反攻不能發動。而德國謀報均傳播各極神速，幾乎各統帥們剛到一個村莊，敵機必馬上來轟炸。

由於德軍優良的裝備，我們士兵的缺乏和沒有縱深的配備，又由於我們向比利時的輕進，使我們費八月工夫所造的地下交通網完全失效，等等原因，證明了杜黑將軍所講述的，和德軍在波蘭所實行的閃擊戰（我們相信絕不能打擊根基鞏固的軍隊），是可能的和勝利的戰術了。

亞根是我和英國同志分別的地方。我們隨着汹涌的難民羣到達那個地方的時候，全城已塞滿難民了。在車站的周圍，在道邊上，在人行道上，坐在提包上的難民們好像用人織成菜色的地毯。飯館的食料室，商店，和菜舖的架子，都吃完了。正像吃死屍的蚊蚋一樣。只有慈善的救世軍給我一杯茶喝。於是我裹着一條毯子就睡着了。

早晨三點鐘，和我一齊到達昂布地方梅德里考特上校（Colonel Medico II）給我送信說，在亞根停留是危險的，他要到布希去，並且囑託我和格里（Geo）上尉把所有的隨英軍的法國記者領回，因為他沒有運輸的方法了。

這是一個易說難辦的命令。德軍就要到了，成千成萬的難民都擁擠在車站上，被踐踏

的女人常發出啾啾的聲音。只有一列開往巴黎的火車，各個座位的間隔裏都擠滿了二十多人。慌惑的母親們，由窗戶將小孩子遞給車中的陌生人，並告訴他說：「到巴黎時，請你再給我。」想在車中找位置是無希望的了。最後一位機警的軍官允許我們到行李車上去，那節車是專送各車站和法國銀行的各支行的現款到庫裏去的。

搭着這只能在錢箱的夾縫站立的火車，德機還在不斷的追擊。我們回到巴黎了。平時只費二小時的路程，現在需要十二個鐘頭了。在經過這途，我們都感到洪流般的難民羣，形成慘紅色的波浪，和我同行的新聞記者，因為察着制服，與軍隊的不同。特別引起他們的注意。我聽着他們喊道：「降降傘部隊！」在一個車站上，一位女人告訴我：他們在那一個車站上，捉着一個冒充軍官的間諜，一個警察將他已經擊斃了。大概不是真的，然可見這次潰敗所生出的驚疑恐怖的空氣了。

雖然，守行李車的是一位誠實的法國老人，有斑白的頭髮，和強健的體格，他仍然是很沉靜的樣子。

他用手擋着門對難民說：「我沒有辦法，真的毫無辦法，你們不能進來的。這是一節裝錢的車，上邊命令不許任何人進來，所以我不允許任何人搭車。不，親愛的太太們，我不是狠心的人啊。爲甚麼你們全都離開家呢？因爲一個炸彈落到你們的鄉村嗎。嘿，那有什麼關係呢？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我遇到許多的炸彈水雷和炮彈，比現在厲害的多呀。並無一人因避彈而逃跑啊。方才你說什麼來呢？你說你不是士兵嗎？啊，你是的。在這次戰爭中，每個人都是一個戰士，因爲每個人都有遭受攻擊的危險啊？你們擁塞道路，包圍車站，誤了火車和軍隊，就等於幫助德軍，你們不知道嗎？現在只有一件事關係最重要，打勝仗。」

火車開得很慢。在上面被英國戰鬥機追逐的德國轟炸機正轟炸鐵道。在堤坊上，幾位女人先指着天，後指着地，很歡喜的告訴我們一架德國飛機已經被打下來了。我注視着那位守車者，他毫不介意那些吵雜的聲音，很鎮定的點着那些餓籍子。那時候，我仍然抱着希望了。但是當我看到沿着也亞眠到刻瑞爾（Oisly）的鐵路的難民時，我好象得到天塌地

陷而無可遏止的印象。

我到火車站的時候，已是筋疲力盡了。但我抱着一個心思——趕快地把我們於撤退途中所見的情形報告給當局參考。我們認為很容易的採取幾個方法，就可以剝奪敵人詭計的成功機會。

我立刻編一個意見書送給雷諾，請他把接近前線的各城市的年老的守備司令，都換以少壯軍官，以便能夠堅決的守衛，和禁止人民的移動；並請他注意避免燃燒彈的方法，和其他有關事項。

當我到國防部的時候，雷諾的交際祕書長（也是我的朋友）馬吉瑞（Roland de Margerie）對我說：「請稍候，不久就可見總理了。」

一會兒把我請到總理的辦公室去。我將意見書遞給他；但是我覺得雷諾因外邊的攻擊，精神已經頹喪了，而對我們的鄙陋之見，毫無實行的意思。此時，雷諾給我一個印象，他好象一個勇敢的拳手，正想踏穩腳根，可惜已經動搖而有遭致命的打擊危險了。我停有

一分鐘，臨走之前，我問他：「還有希望沒有？」

他答道：「只要病人還沒死，醫生總是對他家人說有點希望。」

他站在書桌的前面，仰着頭，兩手指在兜裏。從那天起，我就再沒有看見他。

次日，我的長官們接待我。我看他們不很悲觀。他們對萊漢（F. Latham）和恩河（Kasane）

防線的深配備都贊揚。他們告訴我魏剛將軍決定不延長防線，而於必要時，可令敵人的坦克車進入陣地，再由兩翼夾攻以阻止德軍步兵和砲兵。不難得很。在北邊我們的經驗也都損失了，所以新的防線比五月十日的兵力還要單薄。

六月三日，二百四十架敵機轟炸巴黎。那天英國的情報部長古柏（Cooper）先生正到

巴黎。勞斐沙德（Flossie）和朱蓮（Julia）二位部長請我陪他們吃飯。宴會在瑞滋（

Ritz）餐廳舉行的。當我們就席的時候，警報來了。照例的，侍者立刻跑到地窖去了。部長及其僚屬們陷于張皇失措的境地。躲入防空洞罷，似乎顯着胆怯；自己動手挖罷，又顯

得失身分。他們乃對着室的杯盤，於喧鬧聲言之下，呆板的坐着。警報的時間極長，他們越覺着餓，談話越無精打采。一位秘書向巴黎警查總監打電話回來說：「炸得很重。炸彈都落在奧拉翁（Oran）工廠了。航空部已經燒着了，還有幾百處遭到損失。」

我回家以後，孩子們對我講他們看那飛機像一羣蜜蜂的樣子，在日光之下盤旋着。巴黎並未因轟炸而大起恐慌。那時候，我敢說德軍對倫敦的威脅，絕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個樣子。次日的消息說德軍對索漢至恩河防線已開始進攻了。因高特將軍及其部下均已不在法國，我乃請求參加皇家空軍去工作，得到批准。

先鋒隊（Advanced Striking Force）的總司令部設在特裏亞（Troyes）。空軍副司令波雷費爾（Perrain）將軍招待我，當我見到許多空軍領袖時，對其外貌的相似，大有奇異之感。他們的漂亮面貌，銀白的頭髮，和有神的眼睛，所顯出的溫雅而堅定，和鶴而嚴肅的風度，是這隊空軍的特點。

「德國空軍，雖然在數量上超過我們，」波電費爾將軍對我說，「在質上是不如我們的。他們的損失比我們高出兩三倍，所以我們的情勢比開戰的時候好得多了。」

但是，幾天以後，我遇到「夜間飛行」(Night Flight)的著者，法國航空家聖愛煦伯瑞(Saint-Exupéry)先生給我一個不同的報告：

他對我說：「皇家空軍有點太樂觀了。據我個人觀察，我敢說我的一隊飛機已遭受嚴重的損失，不久恐怕不存在了。」

在特婁亞(Troyes)附近，我看到很好的兩個颶風飛機隊(Hurricanes)和幾位十九歲的青年航空員，生着金黃的頭髮，和碧藍而光明的眼睛。每人都有十次以上的光榮勝利的紀錄。但飛機數目之少使我吃驚。英國在法國的飛機只有幾個小隊，至少我到的地方是如此的。當我回到巴黎(在此處我見着敘述德國機械化部隊到弗及勒(Forges-les-Bains)和樓侖(Ronon)城門一個很不詳的公報)把我的印象報告給我的長官希斐(Schiffo)上校，並且說：

「我相信英國還有大批的戰鬥艦，我們必須使它交給我們，我們和英國的命運都決定於此時此刻了。」

「你必須前往倫敦，」他說，「並由無線電向英國發出緊急求救的消息 S. O. S. … 很顯然的，一般英國人不了解時局的嚴重性。」

「將軍，我願意去，但必須有命令啊。」

「我去對總司令部說。」

總司令部派黑滿特 (Hempstead) 上校前來，我們乃交換意見，決定於六月十日我乘軍用飛機前往倫敦。消息愈來愈壞。德國坦克隊現在已到維昂 (Verdon) 就等於到我們的門前了。

我們很久都不會相信的，因為巴黎仍是很幽靜，很美麗啊，每天早晨打開窗戶的時候，我看到可愛的蔚藍天空，布倫森林 (Bois de Boulogne) 的樹木，和凱旋門 (Arc de Triomphe) … 華倫山上的堡壘 (Fort of Mount Valerien) 在煙霧籠罩中，好像佛羅稜廷

(Florentine) 的修道院的樣子。樓下邊的花園裏，僕人正澆着繡繡的秋海棠，一個修着水籠頭的工人在哼着軍歌的調子。一切沒有變化，德軍不會靠近巴黎的罷。

九日是星期日，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由廣播中聽到新的地名了。滿特 (Mantes)……龐安 (Pontoise)……我們還在休息如常的時候，德軍距我們只有半小時的路程是可能的。嗎？香港灣仔 (Chuan Tszsees) 街前咖啡店的，平台上客都滿了。我們在威登廣場 (Place Vendôme) 的一個大旅館的院中吃的午飯。許多的人都在進餐。唯一的移動現象是海軍部門前的大批運糧車。水手們正在取出箱子和卷宗。我們遇到巴黎報的編輯，問他是否準備撤退，他說政府對此問題還未一定。我們又到電影院去，那裏也很擁擠，我們看到納維爾克的攻擊和巴黎空襲的影片。上一星期的悲劇已經變為消遣的材料了。

六月十日早晨七點鐘，馬吉瑞來電話勸我最好把我太太送到南方。

「政府要遷移了嗎？」

「今天。」

「但是巴黎必須死守啊。」

「不。」

那時候，我知道一切都絕望了，法國如失掉巴黎，就等於一個無頭的屍體。戰事已注定失敗了。

午間，我要到巴克（Buc）航空站去。我太太和我決定去看巴黎我們最愛的場所——也許是最後一次罷。於是和傷兵醫院（Invalides）、賽納碼頭（Quays of the Seine）、道芬廣場（The Place Dauphine）以及聖母宮（Notre Dame）作別。巴黎從來沒有那樣的美麗啊。天空是碧藍的，空氣是溫和的。在街上，交通警攔住我們的車，仍然那樣的彬彬有禮，似乎巴黎還沒有到了末日吧。商店中的女店員們仍是活潑而殷勤，人們的眼睛都含着熱淚，但都沉默的照常工作而未談及這個大的痛苦。

「法國的平民是偉大的，」我太太說，「既質樸又勇敢。這樣的人們怎樣會失敗呢？」

我答道：「士兵無法抵抗機械的啊。長官們令他們守陣地，他們是堅守了。但敵人總來由正面進攻；他們是被抄後路了，被包圍了。」

她說：「我仍不相信德軍會進入巴黎的……」

幾天以前，我們會和一位最好的朋友馬泰爾 Thierry de Martel 醫士對於德軍進入巴黎的事作過很長的談話。

他對我們：「我已經決心了。德軍一進巴黎，我就要自殺。」

最後他繼續對我講大多數人不知怎樣自殺，所以不能痛快淋漓，而是很擔笨的。但是，一個外科醫生的槍法之準確正如他拿解剖刀一樣，準確打到致命之點。於是無言的說：「假如你也不願活下去，我願請我的買歐我的手術。」

晚上十點鐘，我已上了飛往倫敦的飛機，當我太太正揀選要帶的幾件東西的時候，電話鈴響了，是馬醫生打來的。

他說：「我願意知道你們夫婦是否尚在巴黎。」「莫洛亞因公赴倫敦了。」她說。

我個人明晨即行離開此地。」

「我也要離開了，」他用很奇怪的聲音說：「要作個極長的旅行了。」
我太太想起他那自殺的談話，曉得他要自殺，勸他不要那樣的作。

「你仍須對國家有很好的貢獻，」她說：「你的病人，你的助手，你的護士，全都需
要你的領導。」

「我決不能活下去了。」馬泰爾說：「我懂一的兒子，在上次大戰中死了。直到現在，我還相信，他爲拯救法國而犧牲的。今日法國又亡了，我一切的希望都沒有了，我決不
活下去了。」

當醫生在勸他的時候，他把耳機掛上了。

六月二十五日那天，船停亞速爾的時候，我太太看美國報紙，知道馬泰爾於德軍一到
巴黎，就吃馬錢素（Strychnine）自殺了。

在我們則失掉一位至友，在法國則失掉一個模範公民。這位醫生是位賢君子，他有許

多財產，都捐作貧病者的醫藥費，曾救活千萬的人。我曾見他親自施行手術治好一位嫉恨他許久的敵人。在許多的場合上表現他的道義的勇氣。連這樣有勇氣的人都承認不能活下去，災患當前之法國的混亂的嚴重情形可以想見了。

當從佛蘭德斯退却時，在由維美（Vimy）出發的路中，一位站在門口看着難民的老農婦，很傷心的說：

「可憐呀，隊長，這樣大的國家，……」

當我想起馬泰爾死的消息，我覺得真是可憐。想到因為很容易辦到的五千輛坦克和一萬架飛機，未盡及時準備，使那些有勇氣的人們竟至絕望，而偉大的文化遭受了毀滅，確把人氣瘋了。

五 英法怎樣分裂的

從一九三九年九月開戰之初，德國的宣傳目標，就是要使法國和英國分離。它運用非常週到的手法和非常堅定的態度，八閱月如一日的向着這個目標進行。

德國的宣傳者，天天在反覆的宣傳法國是被英國拖入了戰爭；而英國自己却不肯出頭打仗，甚至說英國人從來就沒有自己打過仗。英國人一向只管裝槍，讓法國人當砲手。德國散佈了許多宣傳畫片，有些畫着英國兵把法國兵拖向血海；有些畫着當法國兵堅守馬其諾防線的時候，英國軍官正在巴黎玩弄半裸的女人。到了一九四〇年六月，這個宣傳成功了，不但分化了兩個同盟國，並且使它們彼此反目了。這個宣傳何以竟會成功呢？

第一，許多法國人還懷着一些舊的，強烈的偏見，這些偏見加強了德國的宣傳力量。繼在德國之前，英法兩國原是世仇，其仇恨期間還較德法為長。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九年間，我曾游歷法國幾省，當我以很相稱的口吻談論英國的友好精神的時候，我發覺了一般法

國人對於百年戰爭仍有模糊而激憤的記憶。誠然，一九〇四年德爾卡舍（Dolciase）曾調解了兩國的糾紛並成立了英法協商；誠然，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英國曾以全力幫助法國擊敗了敵人；誠然，有百萬英國人葬身於法國北部。但戰後兩國又發生了新的誤解，英國深恐法國將泰滿于強大，竟率爾贊助德國重新建軍。

彷彿在一九三〇年，英國駐法大使蒂里爾爵士（Lord Tyrrell）對我說：「英國人在戰爭後有兩個錯誤：第一，我們以為法國既已獲得勝利，已經變成和德國人一樣；第二，我們以為德國人經過某種奇妙的變化，已經變成和英國人一樣。在一九三六年，德國蔑視羅加諾公約，重估萊茵區的時候，英國輿論醉心和平主義，拒絕對我們加以援手。」

一位英國政治家對我說：「德國人在他們自己的後花園裏，自然難為所欲為的，我們有什麼辦法？」

另一位說：你們反對英國人的，是齊備我們不是好法國人。

齊備不難，我當時對於某些英國人表示反對，乃是因為他們不是好英國人，他們認不

海一個重鎮軍備的德國，在西線築起堅固的堡壘，並且爲復仇觀念所激動，對英，法兩國是同樣的重大威脅。

我對英國人民欽佩和友愛，已非一朝一夕。在一九一四年的戰爭裏，我曾以聯絡官的資格參加英軍工作。按當時得到的經驗，我知道英國對於它所簽署的文約，是照字行事，作到恰得其當的。同時，又知道英國在它存亡關頭的時候，假如可能，也像其他國家一樣，不惜出以殘酷行動。

「不如人」的觀念可以使一個民族和個人一樣有變態的心理，而陷於殘忍。英國沒有這種「不如人」的觀念，並且去那種境地很遠。九百年的繁榮養成了英國人極端的樂觀主義。因爲過去英國每次戰爭都是奏凱而歸，所以它連想都不肯想，戰爭會有敗績的可慮，戰爭會有悲慘的結果。第一次歐戰休戰以後，英國人除了要回到他們的整潔的草原，鄉間的別墅，幽僻的娛樂場所度其習慣的生活外，什麼憂慮，什麼憂軍，什麼戰爭，他們是充耳不聞的。他們的教授告訴他們的青年，戰爭是野蠻的遺風，是容易消弭的。他們從不啓示他們的青

年，假如不用武力作正義的後盾，霸道便要猖獗。

英國過于重視國聯，半由于忠實的理想主義所促成。並且還有一種錯誤觀念，以為設立了國際聯盟，大家胡亂發表幾篇道德，正義的演說，就可以戰勝飛機，大砲。一位英國國會議員尼克爾遜（Harold Nicolson）接到一個選民給他的一封信說：『我希望閣下爲國聯努力，並且希望弭止國際糾紛』

這樣錯誤的觀念，這樣不可靠的自信，這樣不觀察當前事實的盲目情形，所發生的後果，自然是可以預卜的。慕尼黑一席會議，驚醒了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三九年，一直酣睡在蒼翠草原上的大英帝國，但是已經太遲了。它幾乎毫無軍事準備的走上了戰爭之途。

德國宣傳成功的第二個因素是煽惑法國人說：『你看英國並沒有軍隊，英國的打算乃是以法國人爲犧牲，是戰到最後一個法國人爲止的。這種宣傳自然是否曲事實，英國有世界最優秀的海軍，還有一隻很有前途的空軍。只是在陸地上因爲缺乏兵員和武器，只能在敦刻爾克至蒙通（Menton）間的綿長線上，保持一個脆弱的扇形防禦線罷了。每逢我談到

英國軍隊的時候，許多的法國人都以諷刺的口吻問我：「英皇兵？英皇兵在那裏？法國境內真有英國兵嗎？」

一般法國人的心理雖然如此，但是，假如英國於開戰後，能迅速的有所行動，能馬上編成幾個新的師，法國人對英國的信心，或者還有挽回的可能。但英國人的天性一向是不慌不忙的，這種不慌不忙的神氣，在這次戰爭裏表現的尤其十足。戰爭已經開始，工會對於工作的若干限制猶照常保持達數月之久，直到工會會員參加政府以後，才脫掉這些羈縻。商人們天天在焦慮着如何保持海外市場，送交美國和加拿大的定貨單，總不備足數量。飛機的製造，直到最後交給卑維勃魯克爵士（Beaverbrook）負責辦理時止，根本未按實際率進行。一九四〇年三月，法國軍需部長陶特瑞（Trotter）聽到英國技術專家還在爭辯着那種式樣的坦克，才應大量生產的消息，不勝驚駭。同時，北路軍總司令畢拉特（Billotte）將軍對我說：「英國兵？」我知道他們具有良好的品質，他們善于保守陣地，他們的軍官是富有作戰經驗的人，但他們却遲緩的實在可怕。你想戰爭爆發了八個月他們

才有十個師！照他們已經徵調的人數說，至少應該有三十個師！他們未免過於求全，過於謹慎了。德國人現在知道時間因素的重要。我們很有幾次感覺到，能夠趕赴戎機的平凡準備比戰使十全的準備，更為有用。

法國的軍事聯絡團參謀長卡德（Colonel de Cade）也同樣的焦慮，他對我說：關於英國在最近幾個月內，究竟徵派來多少人數，我竟得不到準確報告。我很需要知道確實數目。以便補充聯絡員的人數。但是似乎沒有一個人能知道。他們時時告訴我，從現在到十月，可以有四個師，時而又告訴我只有一個師；時而他們說要組織第二批派遣軍，時而又放棄這種計劃。總之，在這個夏天裏，沒有一件事情值得重視，實在令人煩悶。

然而儘管英國人遲緩，法國人懷有成見，可是德國的宣傳政策直到一九四〇年四月，還看不出有成功的希望。不錯，法國有許多反英論者，而且其中還有一些簡直以反英為職業。但兩國的參謀部的關係却很好，就整個情形說，遠勝於一九一四年。兩國的海軍都

彼此沒有一點秘密，英國把它最近的發現儘量的告訴我們，我們也把所有的案卷記錄完全向他們公開。

兩國軍隊感情的維繫，不是容易的事，語言就是個障礙。但遇到相當的機會，他們却也會互相表示好意，而融洽無間。舉例說罷，我曾親見一隊蘇格蘭兵在馬其諾防線裏，給馬其諾守軍，開一個蘇格蘭風笛合奏會；這個合奏會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法國農夫憶起他們常吹的法國的笛子，使這兩個古老的文化起了親愛的友情。在風笛會奏會以後，他們交換紀念品，要塞守軍很慷慨的散佈他們的勳章，蘇格蘭兵解開腸囊拿出他們的太太或未婚妻的小照，一切都十分合諧誠懇的。從這點可以知道，激烈的反英論者，原來是在統治階級，普通人民中是沒有的。

按許多法國人的看法，英國海軍和皇家空軍是可以保持英國戰爭的威靈的。格拉夫斯比號和阿爾特馬克號及敦刻爾克之役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當法國人聽到了這些報告的時候，甚至最敵視英國的法國人都一致的說：「大家一樣

那些英國人是好男兒。」

皇家空軍在法國很孚衆望。在開戰之初，法國飛機很少的時候，英國空軍的戰績恢復了我們士兵的信心。他們喜歡看一架颶風式的驅逐機上下翻騰的追擊都尼爾式或辛凱爾式的敵機並隨着它的八挺機關槍的火鏟。敵機下墮而化爲灰燼。

英國的飛機——颶風式和噴火式以及最近的無敵式不亞於勃倫亨姆和威靈吞式的轟炸機——都很博得我們專家的贊許。駕駛員和飛機，是珠連璧合的。熱情的青年獵者穿着藍灰色的制服看了使人欣慰，他們的禮貌和他們的勇敢一樣。

「擊落德國轟炸機是難事嗎？」

一天我問一個十九歲的青年，他很光榮的擊落幾架德機。

他說：「不，沒有什麼難的。」

「一切動作都要確實按着飛行學校的教訓去作。這些教訓告訴我追擊敵機，要悍然不顧敵機的火力。等追到距離三百碼左右的時候，就尋找角度使它落入這個螺旋槳上的小紅

圈的中心。這時候，遵循着指示便緊緊的被住管轄着八挺機關槍的開關，這樣，敵機就會被擊毀的。我一向遵守這類指示，在三百碼的距離上，把敵機控制在我的視線的中心，然後一按機紐，敵機就被摧毀。那是一點困難也沒有的。」

但即使飛機和駕駛員都已盡善，盡美，可是皇家空軍的組織會嫌過於複雜。在北歐有一些飛機，由高特將軍指揮，叫聯合隊。另有些在香港地方，以轟炸機為主的叫先鋒隊，還有一批留在英本國保衛工廠和鄉村即所謂戰鬥機隊。

驅逐機的續航力，約在一個半鐘頭左右，因此停在英國本部的飛機，便很少到法國作戰的可能。在敦刻爾克，這些飛機曾一度參加作戰，那是因為那裏距離英海岸很近，從英國機場起飛，半個鐘頭即可到達目的地，除了在法國作戰的時間，還可從容的飛返根據地。但戰場越向南移，這種運用辦法的可能越小。參加佛蘭德斯作戰的英國飛機數目的遞減和法國指揮官對於英國不滿情緒的遞增，都是爲了這個原因。

佛蘭德斯之役和每次的失敗一樣，引起相互的責難。但失敗的原因，並非缺乏勇氣。英法兩軍，有許多單位，同樣的都有過值得讚歎的表現，所以失敗還另有原因在。

英國人說：「我們墮入了重圍，失掉了後方補給，原因是戰場上發生了錯誤，而對於這戰略上的錯誤，我們是沒有責任的。」

法國人回答說：「不錯，那些錯誤是有的，但其中首要的和最嚴重的乃是兵員配備不足，這一點，你們負大部份責任。」

邱吉爾對於色當之戰的一個反響，就是設法消滅失敗的嚴重性。他在五月十五日到了巴黎，大為震恐，於是在他的果決的盛氣之下，「最高會議」復活起來。那一天看到他的人，對於他那獅子般的威怒和雄辯滔滔的魔力，都大為讚歎。他反對退出比利時並放棄盧芳和魯塞爾的意見。他主張要用反攻的姿態，採取攻勢。

但五月二十六日，雷諾到倫敦去發表了一篇氣餒的報告，並且說，除非英國能予法國以大規模的援助，法國將被迫而放棄戰爭。到五月二十六日，由於比利時軍隊的背約，聯

軍乃倉皇撤回敦刻爾克。

敦刻爾克戰役之後，英國的輿論走向了逆流。有些新聞記者發表文章主張：「我們不要把剛剛以極大的犧牲救出來的那些軍隊遣回法國，他們已無補於德國軍隊的崩潰，應該讓他們為保衛英倫三島而犧牲。」甚至沒有這種偏狹自利觀念的人，也主張至少要用三個月的期間，來配備運送把什麼都丟光的軍隊。

在索姆河大戰的時候，英國曾在法國的軍隊還有什麼？第五十一軍團為駐紮薩爾區，幸免佛蘭德斯之難。這次剛是聖梵里高（Saint-Vaast-la-Campagne）區，有一個機械化師正在登陸途中，此外，便只有第三師的一小部份了。加拿大軍隊曾越過海峽，到了法國，但他們到的太晚了，來不及參加作戰，原籍而返。所以在索姆河大戰，對抗德國一百五十多個師的時候，在法英軍只有三四個師。雖然按熟悉當時情況的人們看，這是佛蘭德斯之敗，不可避免的後果。但當時法國軍隊發生瀕肩戰等重任的感覺，却也是很自然的事。

德國的無線電，很得意的評論：「英國兵嗎？他們只知道一個軍事行動——搭船回國。」

。你可以很快的看見他們在報紙上披露他們勝利的消息：皇家海軍已把最後一批英國兵井然有序或毫未流血的搭載回國，實在是很大的成功。」

當時有許多現象，助長了這種宣傳論調。英國軍官，由於佛蘭德斯之敗而氣餒，都變成不可信賴的份子，他們深恐陷入包圍，由於本能的激動，時時企圖逃回海岸。法國指揮官發覺了這種不安情緒，深以其後果為懼，兩國合作無間的階段，就這樣的過去了。

在六月初，兩國軍隊的心情，在我看，都很不安，於是我特別喚起我的長官們的注意。前面已經提過，就在這時候，我接受到英國去的命令，任務是喚起一般英國人民對法國危殆情形的注意，（這裏不包括政府在內，因為政府已經很清楚了）；並且勸說英國，不要過慮它自己的安全，必須派最後一批飛機或最後一批軍隊到法國。

我從凡爾賽附近的巴克（Buce）乘一架皇家空軍飛機出發。我坐的飛機是當天早晨戴勞合（Lloyd）爵士來法的火鶴機（Farringo）。正要起飛的時候，有一個螺旋槳發生

了障礙。

「我們還要打勝仗！」駕駛員氣憤的說。於是又換一架，雖然不如前一架好，但却比較易於駕駛。布倫到加萊（Calais）間的平時航路，現在已經成了危途。我們是向西飛行，在飛機上俯瞰下面德國的軍隊，正跨過諾爾曼平原（Norman Plain），在鄰近康城（Caen）的地方離開法國。我望見了底佛斯河（River Dives）口和加布爾（Cahours）海岸，那是我兒時作青梅竹馬之戲的地方。這是一個漫長的橫跨飛行，可是還好沒遇着什麼意外。在飛機上，克老勞（Crawford）隊長給我講戈登（Gordon）死難的經過。戈登是一個很漂亮，酒脫的蘇格蘭人，我第一次在高特將軍司令部裏遇到他，對他很起敬服之感，後來，他辭掉司令部裏的職務，轉任了蘇格蘭高地人編制的步兵大隊隊長。

我從飛機向窗子向外眺望，看到了小巧玲瓏的奇妙的英國，蜿蜒的道路，美麗的村莊，遼闊的野營，茂密的草原，這些匠心之跡，一一映入我的眼簾，好像一個悅目的玩具展覽會的一角。假如有人想到另外一些飛行員發現了這些房舍，野營，油庫並投下大量的炸

驛，他的心緒一定要緊張起來。

我從漢登（Hendon）航空站，一直走向法國大使館，請大使陪我到英國情報部去。在那裏，我看見好多朋友：情報部長古柏（Duff Cooper）次長尼克爾遜（當代名作家之一）·胡德爵士（Lord Hood）·還有許多旁的人。我到的時候，恰逢每日新聞會議開會，主席是一個外交部職員皮克（Charles Peake），他把我拉到講臺上說：「你的任務既然是要使大家知道法國現在的情形，那麼現在是你的機會，就請你向英國全國新聞界發表談話。」

當時，我不知道要說些什麼，我一點沒有準備，並且倉卒之間，我根本不能很正常的用英語講話。但在那天，我受了法國所遭的悲運和它的可怕的前途的激動，話竟衝口而出。我很驚訝，在我講完話的時候，三百多個新聞記者，都起立報以很長的采聲。我相信在這以前，沒有人像我這樣坦白的告訴他們法國情形的危殆，法國需要協助的迫切，假如英國不加援助，法國就不能支持下去了。

在這個談話之後，尼克爾遜和皮克偕我去見古柏。我接受他的意見，決定在那天晚間，再用無線電把我方才說的話重述一遍，並且英國廣播公司允許撥給我一個最好的時間，就是下午九點十五分，播送特別聲聞的時候。

我倉卒的草擬一篇講稿，結語是：我們的朋友能援助我們，不是在一九四一年，不是在今秋，甚至不是在下個月，乃是在現在。我們知道英國的陸軍和皇家空軍，已經如何大規模的參加了戰爭，我們知道他們已經把能做的事都做了，現在到了要他們勉為其難的時候了。我們完全信賴我們的英國同盟者，我們知道他們準備着罄其所有參加這次戰爭，現在，我們對他們所要求的，是要認清時間的重要。請牢記着敦刻爾克精神。在敦刻爾克之役以前，大家認為從一個半破碎的港口，在幾天內，撤退二萬人都不可能，以最樂觀的人的估計，也不過可以撤退五萬人，而實際，我們却救出三十三萬五千人。是怎樣做到的呢？那只有你們知道的最清楚，你們是這次偉大的撤退者……你們假如再表現一次敦刻爾克精神在這次戰役和這次戰爭中，你們還能獲得勝利……爲敦刻爾克你們拿出來所有的戰艦

現在，你們要再拿出來所有的飛機，所有的人，所有的槍。現在美國已經準備援助我們，我們要共同的向它請求，要在二個月內，爲我們製造出來在平時幾年才能造出來的物品。在幾星期的工夫，要裝備，訓練並調派大量的軍隊，所有的專家一定都是不可能的。不錯，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却必須這樣做，而且一定要這樣做……」

英國廣播公司要求我：次晨再去把原稿用法語，向魁貝（Ouellet）省廣播一次，再隔一天還要去向英國各學校廣播一次。我已經兩夜沒有睡覺，本來十分疲倦了；但看到英國一般人對於我的呼籲，這樣迅速的響應，我高興起來。在那以後的幾天裏，我連續的收到外邊寄來很多的信，大都表示相同的願望：「我們是更援助法國，但是我們總做些什麼呢？」其中有一封是一個女人給我的：

「親愛的莫洛亞先生：你今晚在無線電裏的呼籲，正打動了我的心坎，同時，我相信也打動了千萬個英國人的心坎。個人對於我們英法同盟國沒有多大的幫助，實在慚愧。我準備把我所能節省下的每一個辨士，都購買儲蓄券，用以購買軍需品，或付給英勇的戰

士們，並且我像天德教士講克戰使時一樣，爲法國祈禱。不讓法國絕望，因爲我們永遠不能聽任它沒落的。有沒有接受贈品再變換金錢以捐助法國的機關？假如有的話，我有一個小小的銀茶盤，我很願意把它獻上。我希望你的廣播能引起鉅量的援助和廣大的同情……

最後我感受打擊的是，他們願意援助法國，但是口惠而實不至，並且對於這次戰爭的眞意，竟十分的模糊。當我敘述法國難民的慘苦，村莊和巴黎的被炸，法國軍隊殉國的壯烈的種種情形的時候，我原以爲是他們早就知道的，不意他們傾聽我的敘述，好像把我看作從另外一個星球來的人，這種情形使我特別驚異。

從下面的事情，可以知道我當時的心情。我既突然的接到命令倉卒別離祖國，並且把所有的東西，都損失在阿拉斯和亞眠，我到倫敦去，只帶一個小箱，裏面裝兩件襯衫和日記什物，我的祖國已被敵人侵入。我不知我的妻兒流落到什麼地方，我焦慮恐怕絕望了。儘管我極力節抑我的憂緒，但終於被我所拜訪的第一位英皇朋友發現了。他立刻表示出

來很堅決的樣子，他一向是同情我，了解我，此次對我比平日還殷懇，他留我同他吃午飯，接着他很躊躇的說：「你無須更換……」想到我在世界上只有一套制服，他的體諒雖使

我有些忸怩不安，但却破涕爲笑了。

另外，我從一個海軍軍官聽到一個很有意義的故事。他的驅逐艦擊沉一隻德國軍艦，並俘擄了它的艦長。艦長是個誠篤的天主教徒，在英國軍官看來，似乎是一個值得崇敬的人，他們對他很優遇。驅逐艦艦長，因為要在發令台上過夜就把他的房艙，艦上最好的房艙，讓給這個德國人，但這個德國人停在房艙門口，不肯進去，並且轉回來說：「不，這是個陷井」

「爲什麼說是陷井呢？」

「因爲把艦長的房子讓給一個俘虜，是絕對不可能的。」

「有什麼不可能呢？你是我們的客人。」

於是他們便殷殷懇懇的說明他們的誠意。

他默然的站着注視他們很久，然後，他含着淚說：

「啊，可憐的青年們，你們不知道你們是打誰啊。」

在我廣播以後，有許多青年來看我。

他們對我說：「慚愧得很。我們現在還沒被徵入伍。我們可以參加法國軍隊嗎？我們可以馬上這樣做的。」

我在這裏，得的印象是，英國一般輿論，要求政府採取更強硬的政策，但善意代替不了飛機，坦克和來福槍。

我對我軍中的朋友說：這些信和訪問都很動人，但實際上你們倒能給我們一些什麼？他們的面色忽然變作緊張和沮喪。

他們回答說：「除了開拔不久的加拿大軍隊以外，我們再沒有裝備適於在大陸作戰的軍隊。在佛羅倫斯損失的軍隊，我們還無法補充。自然我們還可以派遣若干架飛機，但是

，我們的飛機製造廠和我們的港口，關係我們國家的利益，也應該照常防衛。假如，你們能支持到一九四一年……」

於是我知道這次戰爭是失敗了，法國再沒有希望了。

我對法國大使考賓（Charles Corbin）說：「別的不說，最奇怪的是，戰爭已到第十個月，英國還沒有軍隊下山。考賓在這個艱苦時期，始終不洩氣，心情也好。他回答說是的，但是我們也要說公道話。他們履行他們所簽定的條約，是一個字也不含糊的。編制英國軍隊，是規定了日期的，對於這個日期，他們已經都遵守了。錯誤是我們沒要求我們的同盟者，派遣像一九一四年那麼多輛軍車，想這是我們的錯誤，事實上，我們的確沒有權這辦。對於守勢力量和堅固防線的迷信。把我們的參謀部和各部長們給弄糊塗了。」

十三日的早晨，報載德國軍隊已臨巴黎城下。我正在沮喪的閱讀太陽士報，忽然接到一個電話，一個侍女在電話裏告訴我，英后十一點鐘，在白金漢宮召見。伊利沙白（

Elizabeth) 皇后在她還是約克 (York) 公爵夫人的時候，我會拜會過，後來她作了皇后，在巴黎又見過一次。這次真不知那裏來的榮幸，竟蒙召見。皇宮配合着高大的紅衣侍者，無數的紀念畫片和竹器，依然是維多利亞時代的風光。哈定 (Alexander Hardinge) 男爵引導我去晉謁皇后。

「莫洛亞先生，」她說，「我告訴你，我深深的憂慮着巴黎……並且很同情法國人的不幸……我太愛法國了。在兩年前，我們去巴黎旅行的時候，我覺得法國女人的心和我們的心緊密的相印着。我要在今晚對她們播講，把我衷心的赤誠告訴她們。」

她對我講了關於這次廣播的事情，又問我有什麼見聞，並且垂詢我妻兒的情況。當我告訴她妻兒離散久無消息的時候，她那柔和的雙目流露出如許的人類的熱情，深深的感動了我。她說，「我太愛法國了，我認得這並不是虛話，這完全是發於至情。皇后和她的人民一樣，願意盡力的援助我們，但是太遲了。巴黎陷落以後，邱吉爾到了都爾 (Tours) 在那裏，他看見這個國家一切紛亂如麻，大為驚恐。他下飛機的那個航空站，已經被放棄

了。沒有一個政府官吏，沒有一個代表來迎接他。城裏擠滿了難民，他找法國政府，費了很大的困難。

在羅亞爾（Loire）河畔的一個古堡裏，法國總理雷諾告訴他，他主張繼續戰爭，但那樣一來，他或者要被迫辭職而出現一個要求休戰的政府。在這情形下。英國人能說什麼？但邱吉爾雖不能從法國不單獨媾和諾言中拯救法國，我相信英國內閣却希求得法國的諒解：必不空言責備法國，並且恢復法國的完全獨立，仍然是英國作戰目的之一。這是邱吉爾和雷諾最後的一次會見。

六月二十七日，我到維勒雪爾（Wiltshire）去看英護前任駐法大使費浦（Eric Phipps）爵士，見面後他要我同他一起聽法國的無線電廣播。戰爭的呼聲，遠遠的從馬賽傳來：「同胞們，武裝起來！」我聽了，不禁的流下眼淚。同時，聽到了雷諾辭職並發出休戰要求的消息，老實說，這時我深深的感覺我的英國朋友們，在這種對於他們對於我都很痛苦的情形下，舉止的謙恭和態度的慷慨，真不愧他們高貴的傳統精神，他們立刻承認造成這個悲

慘局面的錯誤，雙方都有責任，互相攻訐是沒有用的。這時隨次格里格 (Edmund Grigg) 爵士派人請我去。

他說：「我想要告訴你，我們瞭解你們，我們不怪你們。我們過去未能及時的援助你們，你們自然別無辦法。」

接着他對我講到法國的艦隊，那是使全英國最感煩惱的事情。以後的幾天空氣更加緊張。休戰條件舉國震駭。據說駐在波爾多的英國大使康伯爾 (Sir Ronald Campbell) 不能再得到一點消息。勞合 (Lloyd) 爵士和斯佩爾 (Spears) 將軍雖奉派參加德法休戰的討論，但據說，他們的處境一點不比大使強。這時法國駐英大使考賓提出辭呈說：他不能代表一個與他素日主張相反的政策。堪本 (Roger Cambon) 繼任了他的職務，但不久，就踏着致賓的覆轍，照樣跑回去了。堪本以後，由賈斯太蘭 (Boni de Castellane) 作全權代辦。法國在這樣艱難的情形下，有這個人駐在倫敦作它的代表，原很幸運。但事既至此，他們還能作些什麼呢？

最後，邱吉爾想象力豐富，政府繼續抗戰建議組織法聯合政府，由法國人主持，雙方每一個人民都給以英法民族兩重國籍。一切問題共同討論，一切資源共同利用，這是一個驚人的建議。假如這個建議，在幾星期前提出來，無疑的，可以轉變戰局，但到這時候，法國已經筋疲力盡，除了緊急的援助：飛機，坦克，大砲以外，什麼東西都沒有用了。

我聽說，魏剛將軍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曾想起一段關於邱吉爾的軼事，從前在脫蘭斯瓦爾（Transvaal）戰爭的時候，邱吉爾在下火車的剎那間，被兩個南非荷蘭移民俘獲，並且以裝備刺刀的步槍逼着他。

「在這剎那間」魏剛將軍說，「假如有人在車廂裏對邱吉爾說：抵抗！我家裏有無數的資源，可以歸你支配。」這個建議，自然不能改變當時的危局。法國現在的處境正是這樣；刺刀已刺入法國的心臟，它已竟解除武裝，它只得像邱吉爾君一樣：聽天由命了。」

我不知道這段敘述，是不是事實，假如是事實的話，真是十分相似。邱吉爾相信他已

經給法國一個非常的建議——這樣重大一個建議，曾引起許多閣員對他的批評，他看見大家對於組織聯合政府的建議，態度淡漠，他憂心如搗，同時，有許多英國人和他一樣，同感憂慮，對於法國友誼最深的人們，痛苦最大，因為他們是關懷最殷的。

英國大批評家德茫 (Desmond Mac MCarthy) 對我說：「慚愧得很，我高興變成一個法國公民。」

我同他和另外一個名作家茂爾太慕 (Raymond Mortimer) 在一起消磨一個陰鬱而引人的晚上，我聽擺脫當前可怕的現實，而談論古今的閒事，戰爭以來這還是第一次。這樣的會談，在四五世紀的時候，沃吉爾 (Virgil) 和霍累斯 (Horace) 的文人學者，於侵略者的鐵蹄之下，在高盧羅馬 (Gallo-Roman) 的村莊裏，一定也舉行過。我們談到法國詩人，他們兩位都很熟習。我們朗誦馬拉靡 (Mallarme) 和瓦雷里 (Valery) 的詩，又朗誦馬栗比 (Malherbe) 和拉辛 (Racine) 的詩。德茫說：

「我們知道我們受很多事情的威脅，第一件是死，這倒沒有什麼要緊；第二件是暴

力。這却比較嚴重了。我們要相互信託，我們的責任是拯救還可拯救的事，而且只有我們才有這樣責任。要完成我們的責任，必須先做到兩件事。第一，我們永遠不忘我們的朋友及朋友們的溫煦和感情。即或我們多年不見，有人向法國人說，英國人是惡人，有人向我們說，法國人欺騙了我們，我們要想到我們認識的一些法國人或一些英國人，都是思想高尚，襟懷宏闊的，只要有機會我們總要加倍的親愛。現在的世界缺乏仁慈，我們要來匡正它。L

那天晚間和我同巴英（Maurice Earing）在愛蒲家裏一樣，在我心裏又浮現出來一類至善的英國的影像。但事實的艱難，永遠在我的腦海裏深印着不愉快的記憶。兩國的關係日趨逆轉，坦克戰術專家戴高樂將軍，在倫敦招募了一大批軍隊，他的計劃使許多法國人在良心上發生了一個苦悶的問題。有些人以為在國家存亡絕續的時候，第一應該保持法國的統一；有一些人為拒絕承認休戰，而加入了戴高樂將軍的陣營。

倫敦和波爾多用廣播無線電互相攻訐，我對於這些毫無用處的尖酸舌戰，十分嘆息。

我勸說大家應當心平氣和些，但沒有多大效果。英國現在只計劃怎樣組織它自己保衛的力量了。在五月裏，它還缺乏裝備充分可以派到法國作戰的軍隊。但七月裏，它却有了一百多萬受過充分訓練的軍隊，用以保衛它自己的領土，對抗任何侵略。加拿大和澳大利的軍隊，也準備在英國放他們的第一槍。公路兩旁，城市裏面，你隨處可以見到，正在修築堡壘。鑑於我們的慘苦的經驗，英國最高統帥命令人民，在遇着攻擊的時候，要躲在屋裏，公路上禁止行人，否則，要用機關槍掃射，在每個村落裏，都招募大批義勇隊，準備抵抗降傘隊。到處都可看出，堅決的精神和背城借一的勇氣。這種精神和勇氣都是新近才發生的。英國因為突然發覺法國軍隊並不是無謂的，它在海島上，也不能高枕無憂了，英國在歷史上，每逢危險的時候，不但不罷挫它的銳氣，反而使它更堅強起來。

七月二日，法國軍事委員會解除我的使命。當時一則因為，英法間的交通已經斷絕，再則，原允到波斯頓拉維爾學院講學，所以我就決定首途赴美。

我搭一個英國遣送幼童到加拿大去的船，在甲板上的景象，使我又傷心，又驚訝，感

千的幼童在日光下，圍繞着保護他們的大砲遊戲，復仇號巡洋艦和兩隻驅逐艦護送我們。在艦上，從釘在中倫裏的公報上，我知道了奧蘭（Oran）之後的駭人消息。

糾纏我幾星期之久的許多不幸事件，以這一件為最可怕，我是一個法國人，並且是英國二十多年的老友。現在，我好像一雙離散的父母的兒子，跟着忍痛的母親過活。我的心裏說：「我的祖國對呢？絕呢？」我很傷感這相醫甚般的兩大民族，竟宣告分離了。我倚着船的欄杆，那海在翻着大理石般的浪花，雄偉的巡洋艦默默的從旁邊滑過，我呆望了很久。同船的英國人，同情着我的憂傷，從我身旁擦過，默無一言。我忽然想起德菲（Miss Carthy Defford）在一天晚上對我說道：「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們要牢記我們的朋友是不會變的。」我不知不覺的，低聲的唱着蘇格蘭古歌：「牢記着舊友罷：」。復仇號砲塔的高處，燃着燈光；閃爍的光芒傳給我們一個神祕的消息。

六 法國的遺囑

每逢我想起載我到加拿大去的那隻滿乘幼童的船，我就好像回憶一個夢境，那個浮在海上的一大育嬰堂，似乎並不是真的。在甲板上，千百個金色捲髮的小朋友跳躍着，嬉笑着，呼喊着，爬上帆索，登上艙梯，有時擲下來，便哭了，一會兒又笑了。他們把最幼的小孩像小馬那樣的拴起來，然後，褓姆就可以把他們繫到他的椅子上，或者就用手扯着。有一個八歲的男孩叫阿德利安（André），我同他住在一個房艙裏，他隻身作這長途的航海。

在這個長的旅途中，阿德利安始終是一個謹慎，嚴肅的伴侶。他在一個英國學校上學，從幼養成了自治精神，他不懼怯，也不莽撞，他盡力自己服事自己，他練習爬上他的牀鋪，他的牀鋪很高的在我的牀鋪的上邊，他每天晚間作一次冷水浴，早晨把睡衣疊好放在枕頭下面。他整潔，沉着而且勇敢，他的父母住在賽姆（Seymour），他叔父和他在格拉新哥

(Grisson) 分手的時候，給他七先令六辨士，這是他的全部財產。我的雖然比他多一些，但我却比他更儉省。他在船上的舖子裏買鉛筆，口笛和糖果。到了加拿大的時候，他只剩了五先令。他引爲最難過的，是把腳踏車留在蘇格蘭，但是他把車上的燈却帶在身上。在夜裏醒的時候，他常常很得意的把房艙照的通亮。

我有時候黎明起來，在小朋友們還沒出來佔據甲板以前，先在甲板上玩賞一下海洋幽靜的美。漆黑的，雄偉的復仇號，却已在用燈光和我們打招呼了，兩隻巡洋艦圍着它游來游去，好像幼犬圍着它們的母親一樣，有時候，其中的一個突進很遠，追擊幽怪的潛艇。

一天早晨，有一個英國作家²，我很愛好他的作品，他這次是到美國去講學，走來坐在我的身旁。

他說：「我知道你在船上，我很冒昧的來找你談談，因為關於法國這一幕可怕的劇，我還有些地方不明白。我不是說軍事的失敗，因為軍事的失敗，由於兩國沒有準備和戰略觀念的錯誤，已人人皆知。我所驚訝的是道德的墮落。關於這一點，我想請問你幾個問題

，假如不至於使你太痛苦的話。」

「你可以問」，我說，「這個問題自然是痛苦的。但是我不打算迴避我的痛苦。」

他坐在我旁邊的輪椅上。

他問道，「一九三九年法國軍隊和人民的精神不及一九一四年的好，並且求勝的意志也比較薄弱，你以為這說法對不對？」

「有些法國軍隊的戰績也還不差，不過就法國人民全體而論，這次的戰鬥精神，的確沒有一九一四年那樣熱烈。」

「那麼，為什麼？兩次同為法國的存亡關頭，而且這一次的威脅更大。」

「對的！但一九一四年的法國是比較統一的，一九四一年的法國是一個分裂的國家。」

「法國不是自從一七九三年起，一向是分裂的嗎？」

「夏多伯陽（Cicero）論「恐怖時代」說，遺血的鴻溝永無填滿的一日。無疑的，大革命的記憶支配了法國政治生活很久，但在一九一四年，大敵當前的時候，各黨派

掃除成見，真摯的團結起來，形成一個「神聖同盟」(Union Sacrée)的時期。這四年當
中社會主義者，資本家，急進黨，君主主義者，在軍隊裏都變成好友。可是和平終止了那
個局面。俄國革命使勞動階級發生了新的希望，中產階級發生了新的恐懼。一部份中產階
級，起初想法西斯主義是反共產主義的壁壘，後來又想納粹主義是反共產主義的壁壘。莫
斯科和柏林的極權政府的動作，在他們組織同盟的時機還未成熟的時候，彼此正相反對。
可是他們同樣的化費了鉅額的宣傳費，竭力蠱惑法國民衆。這兩隻外來的魔手在法國兩個
階級的中間，重新劃了一道新的鴻溝。」

「這個「神聖同盟」，是什麼時候解體的？」

「這個「神聖同盟」差不多在戰後馬上就解體了。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巴黎暴動表
明了這個形勢的嚴重。一九三六年六月，巴黎又發生了同樣的暴動，政府當時把許多大小
工廠和商店加以佔領，因此一向支持政府的許多中下層份子離開了政府。除了少數不公正
的僱主外，在法國人人都認為社會政體是穩健的，但是共產黨通過勒魯瓦爾政府的等級，顯

太蠢了。法國是一個私有財產的國家。人民種種我窮你富。鬼魂也登堂私人財產自然引起不快的情緒。在少數賣國的好徒的第五縱隊的同時，又出來一大批不滿政府的人，他們不清楚第五縱隊的陰謀，無意中幫助了外國的宣傳。在蘇聯變作了德國盟友之日，共產黨馬上擴大了這支龐大的叛軍。此外，法國士兵對這次戰爭的動盪，不很了解。一九一四年，法國是被侵略者，情形很明顯。一九三九年，法國是爲了但澤市而自啓戰端，有許多人不知道但澤市在什麼地方，甚至不知道還有一個但澤市。那些通達的法國人明白這只是皮相原因，並且明白，假如我們的盟友被侵略者吞併，唇亡齒寒，最後會輪到我們的頭上。但還有一些人在強調說法國是被英國拖入了這次冒險，並且強調說這次戰爭原是可以避免的。」

「我想英國在法國失掉威望已經很久了罷？」

「倒不是那麼簡單。英國在我們的國家裏失掉威望的情形若用曲線來說明，那曲線是忽斷忽續的變化着。英國最不孕衆望的，是在制裁時期（Time of Sanction）。許多法國

人特別是在軍隊裏都傾向親意。雖然意大利沒有給他們多少鼓勵，但在法意長期糾紛後，斯特萊沙協定（*Accord of Stresa*）給了他們一個英、法、意共同維持歐洲和平的希望。爲了保持阿比西尼亞的獨立，而犧牲意大利陸空軍在歐陸上的支持，在許多法國人看來，似乎是癡狂的舉動。甚至那些不贊同某些報紙敵視英國的激烈論調的人們，和那些繼續敬愛英國的人們，也都一致認爲英國的外交政策是輕率的，是失常的。」

「不久以後，在一九三六年，法國大選的時候，一向持保守主義的英國似乎在支持入民陣線（*Popular Front*），這件事激怒了大部份法國中產階級，並且使它們撲朔迷離，不知所以。另一方面，一九三七年英皇英后巴黎的訪問；一九三八年張伯倫的和平願望引起了那一部份人民的同樣反響。我這裏說的，不是批評，也不是贊許，只是敘述。」

「你說的是中產階級，但不知勞動階級的心理是不是完全不同？我想艾登一定很孚衆望，張伯不受歡迎罷？」

「不完全是這樣。法國社會黨的溫和運動在福爾（*Paul Faure*）和他的朋友支持之下

·很有力量。在巴黎晚報發起募捐給張伯倫在法國建築一所公館的時候，認捐者都是比較貧苦的讀者。你不要忘記法國是一個小商人和小自耕農的國家，而不是無產階級國家。在軍隊裏，中產階級同士紳，學校教員，牧師是後備將校的補充者，法國政府沒有工廠工人的支持打勝仗是不可能的，但是，沒有中產階級熱烈參加，也同樣是不可能的。」

「那麼，中產階級在這次戰爭裏沒有合作嗎？」

「因為它有軍事訓練的素養和傳統的愛國思想，在這次戰爭裏仍然是合作的。但並沒有熱情。因為二十多年來，他們所讀的報紙都是儘量的披露關於政府，政治家和各部長官的劣跡，而這些人們就都是領導他們作戰的領袖，這是一個危險的部署。信念是作戰不可缺少的東西，固然缺乏信念不是失敗的主要原因。假如我們的軍隊有必要的配備，大砲，飛機，坦克；假如他們能獲得初期的勝利，中產階級的心情是可以轉變的。法國是一個古老的軍事國家，瓦爾梅 (Valmy)，奧斯特里茲 (Austerlitz) 都有它勝利的血跡。愛國熱情是可以激動多數懷叛逆思想人們的內心的。但失敗與撤退發生了一個載憂載怨的反影響

許多將校和士兵們想：「畢竟，我們政治領袖，不得辭其咎。」這些政治領袖們除了眼見着國家的毀滅，失望和沮喪；一方面自己省察却是罪有應得。

「你說：「假如我們的軍隊有必要的配備」，並且據你的觀察飛機和坦克的缺乏是你們失敗的主要原因，但進一步解釋，為什麼你們缺乏這種準備呢？」

第一，因為參謀本部持着一種錯誤軍事理論，未能及時購買現代戰爭不可缺少的武器飛機，坦克，戰車防禦砲，高射砲。其次，幾年來，我們的工廠工作效率太小，工作情形低劣。最後，有些工業製造家，把私人利益看着重於國家的安全，鑽營，運動，阻撓從外國購買武器，而這些武器他們又不能自給。在開戰前，政府準備向美國定購飛機，但是因為國會的議員們受了這種卑劣運動的影響，只批准了定購一百架，這個數目無乃太差了。

政府對商人和工人的應付，為什麼這樣軟弱？在國家危急的時候，應當抑制個人的利益和願望，並且抑制個人利益和願望乃是政府的義務。為什麼政府竟失於統制？甚至昧於戰爭的來臨和德國的坐大。是政府的制度不好嗎？但一九一四年，也是同樣制度的政府。

然而……」

「一九一四年沒有敵人的宣傳，而一九三九年敵人曾有五六年的宣傳工夫，並且用盡了兇狠的宣傳方法。民主政治國家，輿論是高能的，政府若沒有輿論的支持，是不能做什麼事的。試考英，法，美三國的實情，就可以知道這三個國家的輿論都被誤解，和引入歧途，起初沒有認清當前的危機，待到要求擴軍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政府領袖們能夠並且也應該領導輿論。」

「不幸得很，政治領袖們都牽就輿論，而不領導輿論。他們仰輿論的鼻息，他們試探輿論的風頭，尋找他們可以取悅輿論的方法，影響所至，使人民貪戀承平之樂，而不願為國家戰死。至於軍事領袖則唯政治領袖馬首是瞻，他們對政治領袖噤若寒蟬。因為缺乏嚴肅的紀律，各部長官和各部門的專家都隨隨便便。在我們的國家裏，沒有一個人是按着時間表工作的。在德國，希特勒說：我要在六月十五日到巴黎，這樣，我必需在五月初展開攻勢，要在五月初展開攻勢，在四月初我需要新的坦克。在他決定了計劃以後，執行他的

計劃的人，假如不能如期作到，就要受嚴厲的制裁。在法國是怎樣呢？必須要先請問一下專家：一個月要出若干飛機和若干輛坦克，需要多少時間才能辦到？專家們可以隨便選定一個期限，並且政府很尊重他們的決定，所以我們的時間表總是落後。戰爭是應當把握住工業使其能應急，而不是工業家來箝制軍事的需要。結果，我們是爲一九四二年的戰爭作準備。但戰爭在一九四〇年就過去了。」

「總之，你們或者特別是我們忘掉了時間是任何行動的重要因素之一。」

「可以說最重要的。希特勒的最大威力就是作事敏捷，在我們深思熟慮的時候，他就開始行動了。」

「你把行動的遲緩完全歸罪議會制的政府嗎？」

「我相信有胆識的政治家可以使議會，甚至頑梗的閣員迅速的行動起來，因爲他關心國家的安全比他自己的政治事業更爲殷切。邱吉爾在英國就是這樣成功的。授與像任何獨裁者那樣大權的法令，不過幾分鐘就通過了。但事實議會政治是英國發明的，所以流緩獨

其他議會政治國家爲少。」

「議會制度在法國爲什麼未能發揮良好的效能？」

「原因很多，第一，法國和英國政府除議會一詞外，幾乎沒有一件事情相同；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巴克（Baker）在巴黎神學校，發表他的著名的演說時，他開宗明義的這樣說：「英國所以能實行民主政治，因爲他原來的貴族政治，這個奇異的理論是對的。英國議會在未變成國家政治機構以前，乃是紳士們集會的場所。在一代代變的過程中，它成長起來，在他們看，純粹是一個紳士們的，具有特殊和古舊習慣的俱樂部，和自由的保護機關。許多英國貴族的子弟們是下議院世襲的議員。所以這裏是舊貴族政治的繼承者，和國家的新的領袖會合的地方。邱吉爾是出身於馬勃羅貴族（Marbleborough），但他的內閣却充滿了工人子弟，並且是最得力的閣員，拍文（Ernest Bevin）就是其中的一個。所以在英國，人民的政府是有它歷史經驗的優越條件的。在法國，議會和國家的文化，商業，勞動各界的實際領袖的分離，很早就已形成了。許多法國政治家都

是律師，他們知道如何審判一個案件，但缺乏政治經驗，並且似乎不能把他們的職業和國家的公務分開。在斯太維斯克（Stevenson）案的時候，他們的態度震動並激怒了一大部份人民，使他們不相信民主政治制度。極右派和極左派都乞靈於暴力手段，這說明了議會制度的未運。

「有一件事是確實的，在政黨間的鬥爭變成階級間的鬥爭的時候，議會不復能發生效用。實際上，這種制度的政府所需要的條件是什麼呢？就是在多數黨坦白的表示了執政的願望，少數黨坦白的表示服從，並且在多數黨執政的一定期間內，不予以非法破壞，那麼，那一個政黨就代替另一政黨執政。少數黨服從的條件是什麼呢？就是多數黨要保證他們行動公正。在議會和民主制度的政府裏，永遠不許發生的一件事，就是一黨當政不能被視為壓迫異黨的開始。英國自由黨員和保守黨員，對於兩黨政權的更迭，並不覺得新奇。現在保守黨員和工黨黨員也是這樣，工黨雖然是維護英國工人利益，但它並不是革命的

我說：「自從在議會佔大多數的社會黨，和共產黨聯合了以後，法國議會的機構已經解體了。極權主義和議會制度，只能任選一種，兩者是不能兼全的。你不能希望法國中產階級，不驚不燥的接受一個明明破壞他的利益的政黨當權。從兩個陣營的恐慌和憤激的情緒超過對於國家的忠愛的時候，法國的民主政治已起了內闕，而不能獲得軍事勝利。」

「Z——」燃着一支紙煙，默默的吸了一會兒，注視伴着我冷冷的停息在海浪上的沙鷗。

「假如追根究底，」他說，「現在真正的鬥爭不是兩個政治制度的問題——民主——獨裁，而是兩個哲學的問題。十八世紀，科學燦爛進步的結果，人們相信理智是萬能的，相信用智慧可以改造社會，這是一個對人性太樂觀的見解。儘管盧梭是個「善意的人」，可是他的學說却引起了一個「恐怖時代」。這個「恐怖時代」一直延續到二十年後法國復辟和「白色恐怖」。整個十九世紀是自由主義的試驗時期，在這中間，有時候竟回到專制政體，就像法國的第二帝國。這個試驗在有些國家裏是失敗了（意大利，蘇聯，德意志

，西班牙），並且產生一個完全相反的理论，殘忍，悲觀起而反抗十八世紀的樂觀主義。信仰真理是十八世紀的特質。二十世紀的人們——，墨索里尼，希特勒——是歌頌暴力。十八世紀相信真理，並相信用科學方法，可以發現真理；而二十世紀的人們除了依據他們自己的需要，並以宣傳方法欺騙世人的真理以外，不知道還有旁的真理的存在。」

我插嘴說：「有一篇驚人的文章寫的很好，是墨索里尼爲馬夏維里（Mussolini）「霸權」一書寫的一篇序。他的理論和你剛才說的一樣就是完全悲觀主義。依墨索里尼的意見，人完全是敗德的動物，除了去輕蔑他的人，不能了解他，任何統治的方法都是合理的，他說，因爲，假如沒有一個暴君，一個國家就要陷入無政府，無政府比暴君還要壞得多。」他回答說：「現在輕視人的人，都是處在優越的地位。那能是永久的得意嗎？我相信不會的，人畢竟有永久不變的。黑格爾的「正」，「反」，「合」的哲學理論是對的。十九世紀的「正」，人性是善的，民意即是天意，二十世紀的「反」，認人是可鄙的怪物，必須要聽他的主人的暴說統治。「合」的時代將要到來；耶穌教已做到了這一點。原始的

罪惡和拯救的辦法，可以說是道德的「合一」。那麼，將來我們的政治的「合一」是什麼呢？大概是這樣：人原是殘忍的動物，漸漸由人世的，神聖的法律教化薰陶而臻於文明，他由於工作和訓練得了自由，他也只能以工作和訓練來保持他的自由。民主政治要想續而不墜，必須牢記它所以能成功的美德。」

我說：「共和一詞比民主要好一些，因為它含有獻身於公共利益的意思，這是共和政治很重要的一个條件。英國是君主國，而實際却是共和，就是因為有這種美德，而這種美德在學校裏就灌輸給青年。法國共和所以能在一八七〇年很快的恢復，並且能克服一個帝國，只因爲共和是當時的一個理想，爲了這個理想，第一共和國時代的共和主義者，曾準備作任何犧牲而不惜。可是在它的政治家把個人利益置於公共福利之上的時候，它破滅了……我深知普恩加資（Poincaré）的爲人，他是一個心地偏狹的人。有一次他問我，你爲什麼要到倫敦去？一個人離開康考爾德（Place de La Concorde）廣場立刻就沒有什麼意思了。但是他有共和政治的美德，他秉性廉正，他從不叫公家的僕役給他私人作一點事。」

國十多年的政治生活，並且幾乎毫無間斷的掌握政權，最後仍是兩袖清風……考之英國大政治家的私生活，都是很清白的。格拉斯托恩（Gladstone）討厭邱斯累利（Disraeli）邱斯累利與皮爾（Peel）不睦，但是他們三位都是廉正的人物，這就是國家所以好的原因。孟德斯鳩曾說過，假如我記的不錯的話，尊嚴是君主政治的主動力，美德是共和政治的主動力。」

沉默了很久，他說：

「總之，我們想要犧牲一切而保護的真正自由是什麼呢？我們要求法律對一切都是同樣的，這才能確保機會平等；我們要求每個人都能自由接近知識的來源（這才是思想自由的真諦）；我們要求每個人都能自由表示他的意見，只要他不是企圖破壞賦予他自由的國家；我們要求政府改進，假如大多數人都坦白表示了同樣的意見。我的意思似乎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我說：「不過這不是說，政治家每天在行動以前，都要試探和諮詢。」

論，把輿論看作實益之神。即使一個國家的領袖，不是每個待殊行動，體察民意，亦步亦趨，仍然可以無損於國家的完全自由。假如在一九三六年，英國的大臣們智慧一點，不顧忌輿論而支持法國，我們相信可以避免這次戰爭。」

太陽已無高升在天空。捲髮的小孩子們，又開始盤據在甲板上，球子在船面的椅子當中滾着。

「那些球！」他說，「假如我們完全把它們交給這些小孩子，或者我們更能多注意到使我們感受威脅的危險，事實，我們的國家，老早就逃避到虛偽的世界裏，而沒有面對着苦痛的現實，鼓起勇氣苦幹下去。英國人把大部份時間消磨在拍球和足球上；美國人消磨在壘球和電影上；法國人消磨在地方政爭和文學的派系上。」

國家已有了安全的保障，運動和藝術是消遣的最好的方法，但在重要問題沒有解決的時候，竟把他們擺在其他一切行動之前，那是極頂的愚蠢？政治本身可以變作一種運動。但在切爾斯題當前的時候，時間是不允許虛擲的。在我們的小孩子們沉湎於好萊塢影片的時

候，正是德國青年從事創造真實世界的時候……其結果是很嚴酷的。」
他起來說，「吃早飯的時候了，粥，蛋和醃肉即是現實，我什麼都不輕視。」
剩我自己費了許久的時間來想這段會話，我取鉛筆，在我正讀着的巴爾扎克(BALZAC)
所著的一本小说的書皮上，這樣寫道：

救亡之策：

鼓起勇氣——一個國家若不能準備為它的自由而死，將必滅亡。

行動迅速——一萬架飛機及時建造出來，強於戰後五萬架。

指導輿論——領袖是要指示途徑，不是跟着跑。

維持一個統一的國家——政黨是同船的旅客，假如他們把船破壞，必將同歸於盡。

不容輿論受外國的影響——維護政見是合法的；但是接受外國的金錢來維護它們便

是犯罪。

即時嚴厲懲處任何非法的舉動——鼓動非法舉動是犯罪。

不容青年受削弱國家統一的教導——不圖自存的國家是自殺。
要求治者倡導正常生活——任何惡習都是給敵人以可乘的機會。

在信念上，生活上養成抗戰的熱烈情緒。

信念可以創造軍隊，可以創造武器。

保存自由比服事暴君更要熱烈。

我剛剛寫到這裏，阿德利安跑來舉起一個流血的手指給我看。

他說：「我自己把手割了，你會纏嗎？」

就我所能的，給他纏好了。

七月十二日，我到哈里法克斯（Halifax）港。次日乘車赴蒙特里奧（Montréal），在車站月台上，有幾訪員用法國話向我問候，聲調輕妙，饒有挪曼人及古代人的餘韻。這

聲調使法國籍加拿大人的談話特別柔媚動人。在這些訪員中，我又遇見了我的夫人。我同她六月十日在巴黎分手，在我留居英國的期間裏，一向沒得到她的消息。她告訴我她所遇見的一些事變。

六月十一日晨光曦微中她離開紐里樹森（Neuilly-Sur-Seine）（我們住的地方）她坐摩托車從巴黎赴奧爾連（Orleans）她見到滿路都是車子擁擠着，開車的速度同步行一樣的慢。行近道登（Dourdan）的時候，德國飛機連續三次向難民投彈，並以機槍掃射。當時防守的人，迫使我的夫人和她的旅伴們臥倒在濠溝裏。在她的身旁，有好幾個孩子，肩膀與股際受了傷，還好，一個沒有死。

在唯爾莊（Vierzon）他和數千個家庭混在一起，在她自己的汽車裏過夜。汽車是那些逃難的人唯一的家。次日她到巴里窩（Parigord）我們的鄉村住宅。那裏已經住了一百多個難民。從那裏她幾次企圖着和留居倫敦的我取得聯絡，但是所拍發的電報全沒得到答覆。過了五天，她心緒惶惶，又到波爾多去，在那裏，她看到了令人心碎的景象——一個

嚴密的破壞。

法國的統治體制，在我們看來雖似堅固，但在德國空軍威力之下，它已瀕崩潰了。因為它沒有統治天空的權力，所以又喪失了統治陸地的權力。警察已經放棄了維持秩序的企圖。在波爾多，你可以隨便走進內閣總理或總統辦公廳，而無人阻攔。外國駐法大使們徘徊於當地的專門學校門口，因為在那裏，設立了一個辦公處告訴他們鄰近那一所行宮是指定給他們的，戴着珠飾的大使夫人們都揮汗頻頻，坐在汽車裏像蒸籠一般停留於多爾尼（Allées de Tourny）大街上。我的夫人邂逅了我的一位朋友，他是個內閣閣員，他告訴她雷諾正要辭職，新政府將要求休戰。

她說：「我想戰爭將要在北非繼續罷！」

他回答說：「那是雷諾的計劃，但這個計劃在內閣裏已經以十三票對十票被否決了……現在雷諾一定是和勒白倫總統密談……我相信他希望打銷休戰的要求，重任總理，但那只是夢想。休戰一定是就要簽字，德國人週內可以到達此間，你最好儘量設法罷。」

我的夫人說：「我往那裏去。假如休戰協定簽字，我丈夫將在倫敦退伍，他恐怕能回法國罷？」

「靠不住罷，英，法國的交通，現在幾乎完全停頓了。」

我的夫人知道我已經接受了拉維爾（Lavelle）學院講座的聘約，所以他決定到美國等。因為她還有拉維爾學院的函件，所以簽證護照沒有什麼麻煩，於是她欣然的離開波爾多，因為在那裏，她看到許多自私自利和漠不關心的人們在法國悲哀中，仍沈溺於燈紅酒綠之中，使她非常痛心。

在六月十七日晚上，她經過國際橋從漢岱（Hendaye）到厄隆（Orre）遇着幾個法國稅官，他們哭了。

他們說：「夫人，我們為什麼失敗了？我們到底不能繼續戰爭了麼？敵人不能給我們保留一個最低限度的法國麼？敵人能深入到此地麼？」

在看了波爾多悽慘的情形以後，這些可憐的人們的愛國精神又激出了新的熱情。

最後於六月十五日在里斯本 (Lisbon) 由於同行整夜的幫忙，得以乘搭飛機飛到紐約 (Yarkee Clippers)。她到紐約後，馬上由倫敦法國大使館轉給我一封海底電報，我立刻答覆告訴她我的行程，但英國檢查機關不許說明行期和船名。最後她從美國報紙上得到我首途去加拿大的消息，所以他能於早六時在蒙特婁 (Montreal) 的文期嘉 (Windsor) 車站月台上迎着我。

我們重慶圓圓的快樂和法國不幸的可怕的憂傷混合在一起了。

我夫人說：「你知道今天是七月十四嗎？你還記得麼？去年在巴黎……在香港麗芝路廣場上那個雄偉的閱兵典禮……每個人有多麼快樂和驕傲啊！」

「是的，是七月十四，在許多蒙特里奧的窗子上飄揚着法國國旗，法國籍的加拿大，
……的。我想：對法國的本身，它要忠於它自己的……。」 (完)

國家圖書館



002407550